

## ※學林誌傳※

# 李源澄先生 (1909-1958) 學術年譜簡編

王 川 \*

### 編撰說明：

第一，近半個世紀以來，蜀學大師李源澄先生（1909-1958，字浚清，又作俊卿）及其生平事蹟與學術貢獻，似乎逐漸為蜀人乃至於華人所淡忘。李源澄先生（以下簡稱為「先生」）的傳記公開出版者僅二種：第一種，四川省《犍為縣志》編纂委員會編纂《犍為縣志》之〈李源澄傳〉（以下簡稱為〈先生傳〉），篇幅為五、六千字；第二種，先生知交、學者賴高翔先生（1907-1993）所撰〈李源澄傳〉<sup>1</sup>，雖僅二千字，卻堪稱字字珠璣，二者內容有不少相似或相近之處。至於記述先生傳記之未刊稿，還有先生的自述等珍貴文獻，惜已經不存人間。在一九五七年先生被打成右派後，迫於形勢，先生曾自撰「檢討書」，未寫完就發病，到次年先生去世，仍未完成，先生在該「檢討書」自述「少年之生活及讀書、尋師、著作、訪友、任教之詳細經歷」，可惜這一珍貴文獻於今不知去向（《宓續》，第5冊，頁120）；一九五八年五月四日先生去世後，先生家人迫於形勢，多次銷毀先生的遺物，如在一九六四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時，將先生所遺之物品，從先生「照像、信劄、著述等，全部焚毀無餘」，以至於先生長女李知勉女士「並其父之生年月日皆

---

\* 王 川，四川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副院長、中國近現代區域經濟社會研究中心主任。

<sup>1</sup> 賴高翔先生為蜀地名宿林思進先生（1873-1953，字山腴）高弟，從20世紀80年代出任四川省文史館館員至去世，參見賴氏門生張學淵〈賴高翔先生傳〉。賴高翔先生所著遺稿，十年浩劫中付炬者甚多，幸喜有〈李源澄傳〉、〈蜀賢張真如先生傳〉、〈憶唐君毅教授〉等多種今尚倖存而較完整，收入張學淵主編：《賴高翔文史雜論》（成都：出版者不詳，2004年），全二冊，其中〈李源澄傳〉見下冊，頁355-359。

不知云」（《宓續》，第7冊，頁334）<sup>2</sup>。所以，現今復原先生生平之事蹟與學術貢獻，殆非易事。

第二，先生求學之經歷，自蜀（成都、井研）至甯，由甯而蘇，所拜大多為國內名師，友人則廣及禹跡；先生執教之序庠學堂，則「暘歷各大學」（無錫國專、浙江大學、四川大學、雲南大學、四川教育學院、西南師範學院後〔改名西南師範大學，即今之西南大學〕），甚至於參加或自辦書院、學院（民族文化、靈巖、五華、勉仁），足履無錫、北平、開封、遵義、昆明等地；先生學術之發展軌跡，由經到子，由子到史，尤以經史為主；先生之文章著述，則遍及經史子集四部，發表的學術報刊雜誌則涉及全國各地，如蘇、滬、川、豫、渝等省市。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林慶彰先生收集編寫有〈李源澄著作目錄〉<sup>3</sup>，基本收錄了先生撰述之主要著述，包括了論文一〇四篇、學術專著六種，頗便學界之研究。

第三，先生個人之生平事蹟，散見於二十世紀上半葉之報刊雜誌，以及其友人吳宓先生（1894-1978，字雨僧）、竺可楨先生<sup>4</sup>（1890-1974，字藕舫，又名紹榮、兆熊、烈祖）之日記等史料之中。與先生文化觀念接近相同的吳宓先生，自從一九三七年與先生訂交後，二位先生成為了多年好友。吳宓先生在所撰《吳宓日記》中，對先生記載甚多，尤其是先生生命最後之二十一年，成為研究先生事蹟及學術最重要文獻之一。可以說，若無《吳宓日記》及《吳宓日記續編》，則一部先生年譜之編撰簡直無從談起。《吳宓日記》對先生有從一九三七年以來二十多年之多處記載（記載先生親人事蹟則幾乎延續到日記結束，與吳宓先生在先生去世後對先生家人慷慨救助相始終）。但是，記載二位先生在一九四九到一九五八年共事重慶高校之日記，尤其是處於新舊社會交替之一九四九至一九五〇年部分，卻恰恰被毀，

<sup>2</sup> 《吳宓日記》分為兩部，即1949年之前部分，共10冊，記錄了先生1910年以來到1948年「個人際遇和在學界的活動與交往情況」，是部日記由三聯書店1998年3月出版時，正式書名為《吳宓日記》，本文簡記為《宓》；1949年之後部分，亦10冊，記錄了先生1950年以來到1973年12月31日吳宓先生「在西南二十餘年的執教生涯」，由三聯書店2006年3月「內部出版」，正式書名為《吳宓日記續編》，本文簡記為《宓續》。

<sup>3</sup> 林慶彰：〈李源澄著作目錄〉，《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17卷第4期（2007年12月），頁61-74。

<sup>4</sup> 據《竺可楨全集》（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卷首的公告，《竺可楨全集》計畫出版共20卷。已經出版了第1-4卷，而竺可楨先生之日記見於《竺可楨全集》第6-19卷，這14冊日記達1000萬字，目前大部分已經面世。

只殘存下極少不完整者（一九四九年全年《吳宓日記》僅殘存四天、一九五〇年僅有五天之記載）。一九四九年後，二位先生在重慶共事之記載，由於文化大革命被抄後全部丟失<sup>5</sup>；或者由於某種原因，吳宓先生未作日記<sup>6</sup>；保留至今者又經過吳宓先生多次不自願修改，歷史真相更須考證。即使如此，作為珍貴史料，《吳宓日記》及《吳宓日記續編》之重要性不容忽視。

基於上述三點考慮，在編製本學術年譜簡編時，筆者力爭將傳統年譜與〈著作目錄〉結合起來，在輯錄先生生平事蹟時，將先生之個人重要學術著述亦按照發表時間先後，分別繫於相關各年月。因而，本年譜帶有李源澄先生「學術編年」之性質，成為了「傳統年譜」、「學術年譜」、「著作年譜」兼具之文獻輯錄。鑒於林慶彰先生〈李源澄著作目錄〉已發表，本文只收錄李源澄先生比較重要的著作。

文中不實及不妥之處，敬俟博聞君子正之。

## 1909 年 宣統元年（己酉） 1 歲

七月七日，農曆五月二十日，先生降生於四川省犍為縣境東南龍孔場。

案：《犍為縣志》之〈先生傳〉謂先生出生於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誤<sup>7</sup>。吳宓先生曾在先生一九五八年去世後不久說：先生「『五十之壽』，於王靜安先生自沉之壽（五十一）略等」（《宓續》，第3冊，頁283）。案：王國維先生出生於一八七七年，去世於一九二七年，吳宓先生計為「壽五十一」，按照這一演算法的邏輯，則享「五十之壽」的先生，應當出生於本年。本文亦採用吳宓先生使用的年齡計算法。

又據《吳宓先生日記續編》，先生的農曆生日為五月二十日（如《宓續》，第1冊，頁162等有先生在多個不同年分慶祝生日的多處記載），借助《中國近代史

<sup>5</sup> 《吳宓日記》被毀部分係陳新尼先生（名嗣煌，1888年出生）懼禍，私自為之；而1949年後《吳宓日記》由於「文化大革命」被抄後全部丟失（可能涉及到李源澄先生）的有多日，此處不列舉。

<sup>6</sup> 吳宓先生未作日記的有：1956年4月9日到11日、5月1日到11日、1957年4月12日至14日、1958年1月30日至2月4日、1964年2月12日下午至13日上午、6月10日至13日、16日至17日等處，據吳學昭在《吳宓日記續編》，第2冊，頁418、425，以及第3冊，頁53等處的「注釋」。

<sup>7</sup> 見《犍為縣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717-719，這是目前公開出版的僅有兩篇先生生平的簡傳。

辭典》等工具書上的中西曆法對照，可知先生出生於西元一九〇九年七月七日。

龍孔場一地，在清朝中葉名環龍場，一九三五年更名為龍孔鄉，一九五八年改名龍孔公社，一九八四年復名龍孔鄉，屬龍孔區；一九九二年龍華鄉併入龍孔鎮<sup>8</sup>。今該地屬龍孔鎮，與宜賓市、榮縣鄰近。

先生名源澄，字浚清，又作俊卿。世人多稱「犍為李浚清（源澄）」（〈先生傳〉，頁 717），在本文中，以「先生」一詞專指。

### 1910 年 宣統 2 年（庚戌） 2 歲

先生祖父富春先生，晚清秀才，授教於鄉里；先生父親昌緒先生，能文善書（〈先生傳〉，頁 717）。昌緒先生育有子女四人，先生居長。

先生祖父及父親時，家境應尚可。這可能是五〇年代講究出身時，先生家的成分被確定為地主的原因（《宓續》，第 7 冊，頁 351）。

先生幼年聰穎，跟隨祖父學習，故深得喜愛；祖父的國學素養，對於先生的成長，起了良好的作用。

### 1911 年 宣統 3 年（辛亥） 3 歲

清朝滅亡，中華民國建立，孫中山任臨時大總統。旋辭職，袁世凱繼任。

同年，先生的老師蒙文通先生（1894-1968，名爾達，字文通）被選拔入四川存古學堂讀書。該校在一九一三年改為四川國學院，辦學宗旨是「保存國學，尊重蜀賢」，時「監督」（即校長）為學者、書法家謝無量（1884-1964，字名蒙，字大澄，號希範，後易名沉，字無量，別署齋庵），教員陣容甚為可觀，有經學家廖平（1852-1932，原名登廷，後改名平，字季平，四川省井研縣人）、吳之英（1857-1918，字伯錫，號蒙陽漁者）、宋育仁（1857-1931，字芸子）、劉師培（1884-1919，字申叔，又名光漢，別號左龔）、曾學傳（1858-1930，又名紹新，字習之，晚年自號「皂江逸叟」）等先生。

蒙先生的同學則有彭舉（1887-1966，字雲生，名舉，別號芸生，筆名芸村，芸蓀）、楊永浚（1894-1960，字叔明）、向宗魯（1895-1941，原名永年，學名承

<sup>8</sup> 戴均良等主編：《中國古今地名大詞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 年），上冊，頁 734。



周，字宗魯）、楊潤六（字正芳）、李珩（1898-1989，字曉舫）等人。蒙先生傳承經史諸大師之教澤，尤其深受今文經學大師廖季平先生之訓誨，學業精進。

### 1917年 民國6年（丁巳） 9歲

先生長弟源委（1917-1990，字端深）出生。先生居長，下有同胞弟妹三人，還有次妹培華，三弟源善。

源委先生隨同先生，四〇年代在四川南充西山書院、灌縣靈巖書院、重慶勉仁書院肄業，並隨先生在雲南大學中文系旁聽。

### 1918年 民國7年（戊午） 10歲

本年，我國近現代著名的哲學家、佛學教育家、唯識宗代表人物歐陽漸先生（1871-1943，字竟無），與古文經學大師、民主革命家章太炎（1869-1936，初名學乘，字枚叔，後更名絳，號太炎，後又改名炳麟，浙江餘杭人）、近代詩人陳三立（1852-1937，字伯嚴，號散原）等先生，在南京金陵刻經處籌建支那內學院。

支那內學院於一九二二年七月十七日正式成立，歐陽漸任院長，主講《唯識抉擇談》，成為民國時期中國近代居士佛學的代表和中心，以及居士弘法有影響的重要集團。歐陽漸先生主要著作《唯識抉擇談》、《孔學雜著》等皆成為近現代國學經典，而其弟子甚眾，如熊十力（1885-1968）、呂秋逸（1896-1989，名澂，早年以字行）、湯用彤（1893-1964，字錫予）、梁漱溟（1893-1988）、黃懺華（1885-1976，字化中）、黃樹因（1898-1925）、王恩洋（1897-1964，字化中）等，皆一時俊彥，影響深遠，中國近代佛教復興過程中的居士佛學獲得了極大的發展，並積極向中國的文化學術各領域滲透。

約本年，先生入學榮縣縣立中學校。該校由近代著名國學大師、文學家、書法家趙熙先生（1867-1948，字堯生，號香宋，榮縣人）主持。先生在校學習成績優異，為諸師所重。

### 1919年 民國8年（己未） 11歲

六月十五日，在李劫人先生（1891-1962）主持下，少年中國學會成都分會在《川報》社址宣告成立。出席會議的成員有彭舉、李劫人、李思純（1893-1960，字哲生）等九人，李劫人被公推為書記。

**1921 年 民國 10 年（辛酉） 13 歲**

本年，蒙文通先生到達重慶，任教於重慶聯中和省二女師等校，向學生講授宋明理學等課程。同事有彭舉、唐迪風（1886-1931，原名鐵風，海外新儒家大師唐君毅先生之父）、鄧少琴（1897-1990，原名作楷，字紹勤）等先生，以及後來成為中共領袖的張聞天（1900-1976）、惲代英（1895-1931）、蕭楚女（1893-1927）等人。唐君毅（1909-1978）等先生在該校就學。

唐君毅先生在〈〈孟子大義〉重刊記及先父行述〉一文回憶說，他在重慶聯中讀書時：「國文則蒙文通先生更為講授宋明儒學之義。吾父遂購孫夏峰《理學宗傳》一書，供吾自學之資，使吾竟得年十五而亦志於學。」<sup>9</sup>這是唐先生自述他學習、研究宋明儒學是從閱讀《理學宗傳》開始的。蒙文通先生以後教授先生學習、研究宋明儒學，當亦同此。

**1922 年 民國 11 年（壬戌） 14 歲**

章太炎先生在上海講授國學，並由當時「愛國女中」教員、《民國日報》撰稿人曹聚仁先生（1900-1972）記錄整理講演稿後，以《國學概論》之名出版。早在二十世紀初，太炎先生就在日本公開講授中國傳統學術，並於一九一〇年刊行了綜論中國傳統學術的《國故論衡》一書。

東南大學教授吳宓先生在南京，與梅光迪（1890-1945，字迪生）、柳詒徵（1880-1956，字翼謀）等先生一起主編於一九二二年創辦之《學衡》雜誌，撰寫了〈中國的新與舊〉、〈論新文化運動〉等論文，採古典主義，抨擊新體自由詩，主張維持中國文化遺產的應有價值，嘗以中國的白璧德自任。十一年間，《學衡》雜誌共出版七十九期，於新舊文化取徑獨異，持論固有深獲西歐北美之說，未嘗盡去先儒舊義，故分庭抗禮，別成一派，世稱「學衡派」。

**1923 年 民國 12 年（癸亥） 15 歲**

本年，先生參加榮縣縣立中學校會考，成績名列第一，畢業後考入四川國學專

<sup>9</sup> 參閱唐端正編撰：〈先人著述〉，《唐君毅全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0年），卷29，頁15-21。

門學校（一九二七年，與四川公立法政、農業、外國語、工學專門學校組合為公立四川大學）。

本年，蒙文通先生離開重慶，東赴吳越，訪求時賢，以探討同治、光緒以來經學之流變。在南京，蒙先生拜謁章太炎先生，與之商討古文與今文之學。後又進入支那內學院，追隨歐陽漸先生，潛心研究佛學。

在內學院，蒙文通先生與同窗好友湯用彤、熊十力、呂秋逸、王恩洋等人，朝夕相處，談古論今，相得益彰。在南京，蒙先生撰成研究論文〈中國禪學考〉和〈唯識新羅學〉兩篇文章。蒙先生在前文考證了達摩以前二十八祖之不足據，並辨析古禪、今禪之異趣；後文則探討玄奘以後之唯識學傳承。二文深得歐陽大師之讚賞，並將〈中國禪學考〉刊於《內學》創刊號上<sup>10</sup>。

#### 1924年 民國13年（甲子） 16歲

本年，國學家、教育家唐文治先生（1865-1954，字穎侯，號蔚芝，別號茹經）籌備及正式開辦了無錫國學專修學校，並親自授課。該校系由一九二〇年底唐文治先生任館長的無錫國學專修館擴充而成。唐文治先生，江蘇太倉人，十六歲師從太倉理學家王紫翔（字祖余）先生，二十一歲在江陰南菁書院受業於東南經學大師黃以周（1828-1899，字元同）、王先謙（1842-1917，字益吾，號葵園）先生的門下，光緒十八年（1892）春考中進士，光緒三十三年（1907）創辦郵傳部上海高等實業學堂（今交通大學前身），出任監督（即校長），悉心教育事業。唐文治先生主持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治校甚嚴，學術方面則相容並蓄，故而教員中治今文、古文者均有，聲譽甚佳。

#### 1925年 民國14年（乙丑） 17歲

正月，彭舉先生到南京晤唐迪風先生；又晉謁歐陽漸先生執弟子禮。時彭舉任二女師國文教習<sup>11</sup>。

<sup>10</sup> 宇陶：〈懷念二十世紀中國卓立不苟的國學大師蒙文通先生〉，[http://cq.netsh.com/eden/bbs/762502/htm/tree\\_\\_6655728.html](http://cq.netsh.com/eden/bbs/762502/htm/tree__6655728.html)。

<sup>11</sup> 彭鑄君：〈彭芸生年譜〉，《崇慶縣文史資料選輯》第5輯（1988年），頁37。

**1927年 民國16年（丁卯） 19歲**

同年，蒙文通先生回到成都，任教於國立成都大學。

**1928年 民國17年（戊辰） 20歲**

向楚先生（1877-1961，字仙樵，一作先喬，號般公）以教育廳長兼任四川國學專門學校校長，延聘蒙文通先生為該校教員，並兼教務長。

先生考進四川國學專門學校，與蒙文通先生締結師生緣。時蒙文通先生以《經學抉要》為講章，先生「得侍講席，甚為相得」；文通先生「固倡廖氏之學者，源澄先生得聞其緒論而羨之」<sup>12</sup>。

先生的同學有陶元甘先生、呂洪年先生（1911-1994，字穰之，號息甕，別署常精進齋主）等人，陶元甘先生後來一度積極參與政治活動，是漢唐史及四川地方史專家。

蒙文通先生的弟子回憶道：

國學院後改為國學專門學校，由謝無量先生任校長，蒙師當教務長，於此時撰《經學導言》，廖大師為題首頁曰：「蒙文通文章如捅底脫，可佩，可佩。」於此足見蒙老師之造詣。謝、蒙共同培育了一批人才，其中最傑出的當數捷為李源澄（字浚清）。李邃於今文經學，對《春秋繁露》一書尤有研究。蒙老師長省圖書館時延為編目部主任並主編《圖書集刊》。李後又獨力在灌縣創辦靈巖學院。可惜此君已於五十年代逝世。與李同班的那批蒙氏弟子，亦即謝氏（無量，因是國學專門學校校長，蒙為教務長）再傳弟子也凋零殆盡。據我所知僅有四川省文史館員呂洪年（穰之）同志還健在。<sup>13</sup>

案：呂洪年先生，十六歲入國學院，曾師從謝無量、蒙文通先生學草書、經學。

**1929年 民國18年（己巳） 21歲**

蒙文通先生大力提倡廖氏之學，引發了先生之問學興趣，蒙文通先生於是為

<sup>12</sup> 蒙文通先生哲嗣蒙默先生（1926- ）語，見蒙默：〈蜀學後勁——李源澄先生〉，《蜀學》特刊第2輯（2007年），頁42-52，引文見頁43。

<sup>13</sup> 陶元甘：〈蒙文通老師的美德〉，《鹽亭縣文史資料選輯》第10輯（1993年），頁62。

函，介紹先生到井研縣向廖平先生求學。

七月，先生到井研縣廖平先生宅，登門學經。廖平先生年紀七十八歲，早已離任還鄉，住在井研縣城東門外。時廖平先生右癱，在病中，雖不辭辛勞，悉心指教，但是也不能給先生太多的指導。

廖平先生的女公子廖幼平先生，在覆劉雨濤先生函中，就如是指出：

李源澄先生到我家時，我正停學在家代父親照顧家務。因之我接待過他，並為他們安排過學習的地點和時間。但對他們請教的内容，卻一無所知。可是，從表面上看來，父親不是系統地講經，而是解答疑難。他們在井研住了一兩月就走了。幾年後，父親去世了。從此再也不知道李先生的消息了。<sup>14</sup>

與先生一起學經的同學還有仁壽陳學源（後入歐陽漸支那內學院）、胡翼等人。就這樣，先生在廖平處學習了約兩個月，成了廖平的關門弟子。蒙默〈蜀學後勁——李源澄先生〉：「時廖氏已老病不能講授，唯解惑答疑而已，前後略有數月，故澄源先生亦得及門廖氏。逾二年，廖氏卒，而源澄先生遂為廖氏關門弟子焉。」

（《蜀學》特刊第2輯，頁43）

### 1930年 民國19年（庚午） 22歲

八月，先生友人、暨南大學及大夏大學教授陳柱先生（1891-1944，字柱尊）的《公孫龍子集解》即將出版，先生為此著成書，亦有薦引之功。陳柱先生在《公孫龍子集解·例略》云：

《集解》成後將刊行，散失於一二八之役，近始恢復舊觀。尋得友人錢子泉教授《公孫龍子校讀記》一卷，校訂注文。足補嚴氏所未備。後又得老友譚戒甫教授《形名發微》十卷，又以李源澄君之介，得伍非百教授《公孫龍子發微》稿本。二君於公孫子之學，最為闡幽抉微，爰采入吾書。

陳柱先生，廣西省北流縣人，為唐文治先生門人，係民國時期廣西僅有的「學術大家、國學巨擘」<sup>15</sup>，在儒學上造詣頗深，在本年前後，他與先生在儒學研究上，多次論學，並有爭論的文字發表。由此亦可知先生與子學名家伍非百先生（1890-1965，本名伍程驥）的交情匪淺。

<sup>14</sup> 張學淵主編：《賴高翔文史雜論》，下冊，頁359。

<sup>15</sup> 張京華、王玉清：〈陳柱學術年譜〉，《廣西社會科學》，2007年第2期，頁100-105。

**1932 年 民國 21 年（壬申） 24 歲**

章太炎先生從上海到蘇州講學。章太炎自述說：「余自民國二十一年返自舊都，講學吳中三年矣。」（《制言半月刊》創刊號 [1935 年 9 月]）

先生出川東下，到南京，入支那內學院，追隨大師歐陽漸先生學習佛學、諸子、明代理學。

同年入支那內學院的還有四川省巴縣陶闔士先生等人，陶道恕先生（1921-，闔士先生哲嗣，四川大學中文系教授）在其父的傳略寫道：

一九三二年，先父（陶闔士）重返南京，再入支那內學院，從歐陽大師學。……巨贊、彭舉（芸生）、劉衡如、李源澄、談壯飛等時在內院，李、談均以師禮事先父。一九三三年，先父返蜀後，又以個人名義接受學生，親自講授，學生中有成就者為謝子巽等。<sup>16</sup>

先生在內學院，與內學院教師、同鄉、歐陽漸先生弟子、現代著名佛教學者王恩洋先生（1897-1964，字化中）甚善。王恩洋先生，四川南充人，一九一九年在北京大學學習印度哲學，後在南京師從歐陽漸先生研究法相唯識哲學。一九二五年在內學院任教。此後十幾年主要從事教學和著述工作，是歐陽漸先生新式佛教教育培養新人中最突出的人物之一。二位先生締結了終身的友情。

六月五日，先生之師井研廖季平先生卒。

**1933 年 民國 22 年（癸酉） 25 歲**

二月，河南省圖書館出版發行了《河南圖書館館刊》第一期，約請先生為之按期送稿，先生應允。時民國以來河南省名士井偉生先生（1875-1958，字俊起，自號戇叟）任河南省圖書館館長多年，「銳意整理舊藏」，「致力於鄉賢遺著之刊布」<sup>17</sup>，井偉生先生積極籌備，終使該刊出版，成為民國時期河南省重要的幾份儒學刊物之一。

井偉生先生晚年在〈雪苑戇叟憶往〉中回憶道：

<sup>16</sup> 陶道恕：〈先父陶闔士傳略〉，《巴縣文史資料・紀念辛亥革命七十五周年專輯》第 3 輯（1986 年），頁 55-56。

<sup>17</sup> 嚴文郁：《中國圖書館發展史：自清末至抗戰勝利》（臺北：中國圖書館學會，1983 年），頁 87。



至於館刊，不惟印費難籌，文字方面亦恐不易采輯。幸次公概認負責，約定大學教授尹石公、盧季野、李源澄等與其弟子姜螫庵、于伯仁、陳兆年等按期送稿。仲甫、恢吾、子猷、怡宣等通志館諸友，皆出共著述之尚未刊者，充實內容。次公除自著外，並將所存聞人遺稿及函劄編入。……〔館刊在〕各省圖書館，北平圖書館寄售最多，南京、江蘇、浙江、湖北、湖南、廣東、四川、雲南各圖書館均有。各大書局，如：北平立隸書局、上海中國書店寄售最多，武昌、長沙、杭州、蘇州、成都、西安、天津、太原各書局亦皆有寄售。……積書既多，每日亦有購書者，頗行流通文化之效。<sup>18</sup>

文中所言「次公」指河南大學中文系名教授邵瑞彭先生（1887-1937，一名壽錢，字次公），一九一二年當選為國會眾議員；盧季野即河南大學教授盧前（字冀野）；陳兆年先生，河北安新縣人，一九三〇年起擔任河南大學中文系助教，時為邵瑞彭先生助手<sup>19</sup>。一九三五年成為先生在章氏國學講習會的師弟。

由於《河南圖書館館刊》約稿的關係，先生一度在開封河南大學短期停留，並跟從邵瑞彭先生學習曆算，邵瑞彭評價先生之學說：「李生年少，而其學如百尺之塔，仰之不見其際。」邵瑞彭先生二十二歲，民初即頗有名氣，一九三〇年時與先生的老師蒙文通先生同任河南大學教授。邵瑞彭先生長於文字學，以詩詞聞名於時，有《揚荷集》、《山禽餘響》等行於世，其推重先生若此。

三月十三至十四日，章太炎應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校長唐文治先生之聘，從蘇州到無錫來講學二日。同車來錫的有蒙文通、陳柱尊、陳石遺、諸祖耿（1899-1989）等人。章太炎治漢學，重訓詁；唐文治治宋學，重義理，二人均有容人雅量，並相互尊重。

四月，《河南圖書館館刊》第二期出版，上載先生的論文〈毛詩徵文〉。

七月，蒙文通先生發表〈廖季平先生與近代今文學〉（《學衡》最後一期，即第79期）。

本年，綿竹籍傅平驤先生（1909-2004）畢業於四川大學文學院中文系。時綿竹縣文人縣長許進，著有詩集，提倡文學，創辦中國文學院，傅平驤回家鄉任該院監

<sup>18</sup> 井偉生：〈雪苑戀叟憶往〉，《河南文史資料》第35輯（1990年），頁105-107。

<sup>19</sup> 戴耀法：〈河南大學國文系回憶片斷〉，《開封文史資料（教育專輯）》第12輯（1992年），頁130-134。

學。到了一九三五年二月四川省政府成立，「防區制」取消，川政得以統一，中國文學院遂為解散，傅平驤先生不再任監學<sup>20</sup>。傅平驤先生乃東下，成為章門弟子、先生師弟。

### 1934 年 民國 23 年（甲戌） 26 歲

三月，胡適先生（1891-1962）開始起草長文〈說儒〉，並於五月完成，共五萬餘字。該文是胡適在章太炎先生〈原儒〉基礎上吸收傅斯年先生〈周東封與殷遺民〉之成果而成。

秋，章太炎先生從上海遷居蘇州，讀書治學，講習國學。

十月底，胡適先生趕赴南京參加考試院主辦的全國考銓會議。十一月初結束。在此期間，胡適先生於考試院以長文〈說儒〉為基礎，演講儒與孔子，先生往聽，並有所疑問。先生說：「胡適先生來京，大講其與孔子，我當時在考試院聽了胡先生的講演，頗有種種疑竇。」<sup>21</sup>先生因而開始思考胡適所論，並思考撰寫商榷文章。

十一月二十日，胡適先生發表〈說儒〉一文（載《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集刊》單行本），對在中國最早產生且為秦漢以來歷代傳承的儒家學派，從儒家和儒學的產生、演變的過程，均作了一番全面地追根溯源的探索，是胡適的一篇「得意」之作。該文在學術界引起較大的反響，一時回應贊同者有之，反駁者亦眾。如錢穆先生寫了〈駁胡適之〈說儒〉〉一文、郭沫若先後寫了〈駁〈說儒〉〉、〈論儒家的發生〉等文反駁，馮友蘭先生則持「儒出於官守說」，不贊同胡適提出的「最初儒皆殷人、皆殷遺民」的儒起源說。

### 1935 年 民國 24 年（乙亥） 27 歲

二月，先生發表〈評胡適〈說儒〉〉（《國風半月刊》第 6 卷 3、4 期合刊），對胡適〈說儒〉一文提出了「比較中和」的批評<sup>22</sup>。

<sup>20</sup> 周元邠：〈綿竹創辦中國文學院的始末〉，《綿竹文史資料選輯》第 5 輯（1982 年），頁 89-90。

<sup>21</sup> 李源澄：〈評胡適《說儒》〉，《國風》第 6 卷第 3、4 期合刊（1935 年 2 月），頁 24。

<sup>22</sup> 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編：《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臺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1982 年），第 2 輯，頁 84。

三月二日，太炎先生復書先生，討論《春秋公羊傳》。本年論學書信中，先生與太炎先生書信討論數次，所論之學多屬今古文兩派爭論的主要問題。

七月，先生與太炎先生討論經學的三封信函〈論經學書三通〉在《學術世界》第一卷二期發表。

九月，太炎先生在蘇州創辦章氏國學講習會。講習會以「以研究固有文化、造就求學人才為宗旨」<sup>23</sup>，門人朱希祖、江東、孫世揚、諸祖耿、潘承弼、沈延國、徐復等先生充任講師協助教學；同時，出版《制言半月刊》，提倡國學研究，提倡讀經救國，一時社會影響很大，從者甚眾，可稱得上盛況空前<sup>24</sup>。

先生的師兄諸祖耿先生，時以蘇州東吳大學、振華女中教員的身分入學，後來回憶說：

蘇州許多學者，都很高興，相約請〔太炎〕先生在蘇州長期講學。先生慨然答應，一面作星期講演；一面在自己樓房之後，建造講堂宿舍，創辦「國學講習會」。自說：「我的講學始於日本東京，當時就叫『國學講習會』，這裏現有『國學會』，應該予以區別，所以冠以『章氏』兩字，名叫『章氏國學講習會』。」

章氏國學講習會成立以後，前來參加聽講的，全國各地都有。朝鮮、越南，也有人來，日本學人，亦有前來訊問的。在這期間，我和王謇、王乘六、孫世揚等始終在先生身邊。孫世揚字鷹若，是先生的再傳弟子，為先生高足黃侃（季剛）的得意門生，先生把他留在家中，教他的兒子章奇。這時，我辭去了「振華」的課務，住在先生新建的講堂西面宿舍中，朝夕陪著先生。先生每次演講，都由我在旁記錄，分期刊行。又和孫世揚一道協助先生編印《制言半月刊》，任務頗為繁忙，但是精神卻十分愉快，是我生平難得的快樂時期，明師益友，歡聚一堂，真是無比的幸福。<sup>25</sup>

九月，章太炎先生在《制言半月刊》第一期上，為先生之師井研廖季平作墓誌

<sup>23</sup> 湯志鈞編：〈章氏國學講習會簡章〉，《章太炎年譜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960。

<sup>24</sup> 參見沈延國：〈章太炎先生在蘇州〉、湯炳正：〈憶太炎先生〉，二文皆載陳平原、杜玲玲主編：《追憶章太炎》（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7年）。

<sup>25</sup> 諸祖耿：〈八十七歲自述〉，載北京圖書館文獻叢刊編輯部、吉林省圖書館學會會刊編輯部：《中國當代社會科學家》（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6年），第9輯，頁246。

銘，認為廖氏「行依乎儒者，說經又兼古今」，總的評價是：「廖君之言多揚詡，未流敗俗君不與。」<sup>26</sup>早在民國初年，章太炎、廖季平二先生就在北京多次論學。太炎先生對於廖氏經學的這一評論，得到了廖氏眾弟子的好感。先生針對太炎先生對廖氏經學的評論，頗為感慨地說：「井研有靈，當有知己之感。」<sup>27</sup>

十月十九日，章門大弟子魯迅(1881-1936)去世。

本年中某時段，先生到蘇州，入章氏國學講習會，從太炎先生學。太炎先生時年六十八歲，長先生四十一歲，是古文經學派，而此前先生從著名學者井研廖季平先生就學，廖氏屬今文經學派，而章氏太炎先生認為廖氏「言甚平實，未嘗及迂怪也」。在太炎先生的影響下，讀經、研究國學蔚然成風。

十二月，太炎先生發表〈答李源澄論戴東原《原善》、《孟子字義疏證》書〉一文（《學術世界》第1卷第7期）。

年底，姚奠中先生(1902-1984)從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正式轉入章氏國學講習會，並考取研究生。姚奠中先生年長先生七歲，只是入章氏門牆稍晚，於先生為師弟，後來，又成為雲南大學同事。同年入學的還有湯炳正（1910-1998，字景麟）等先生。

章氏國學講習會的學生，來自全國十多個省分。本年度入學的河北籍學生任啟聖先生（亦康有為一九二六年在上海所辦天遊學院的門人）回憶：

一九三五年暑假開始，共招學生七十二人，籍隸十四省。江浙人居多，北方人甚少，計甘肅一人，山西三人，山東四人，遼寧一人，河北籍者僅余及陳兆年兩人。先生自任主講，每星期擔任四小時，每次二小時。尚有助教多人，以前中央大學歷史系主任教授朱希祖擔任《史記》，前東北大學主任教授馬宗霍擔任《莊子》，孫世揚擔任《詩經》，諸祖耿擔任《文選》，黃惠（紹）蘭（黃侃前妻）擔任《易經》。諸生慕先生名，聽課時無一缺席，其餘則零星點綴而已。先生首講《左傳》，次講《尚書》，最後擬講《說文》，尚未開講即已去世。<sup>28</sup>

<sup>26</sup> 章太炎：〈清故龍安府學教授廖君墓誌銘〉，《制言半月刊》第1期（1935年9月），頁89-90。

<sup>27</sup> 〈李源澄來書〉，見《制言半月刊》第5期（1935年11月），頁2-4。

<sup>28</sup> 任啟聖：〈章太炎先生晚年在蘇州講學始末〉（1962年4月撰），見陳平原、杜玲玲主編：《追憶章太炎》，頁446。

先生在章氏國學講習會，先後來學的四川籍同學有多位，如綿竹傅平驤先生、江津周光武、南充李恕一等先生，均先後入學，堪稱是太炎先生弟子。而先生與傅平驤先生更受到太炎先生的特別青睞，被視為根柢深厚者。

關於章氏國學講習會的四川籍先生弟子，四川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李潤蒼(1929-1985)先生歸納指出：

一九〇四年，章太炎在東京主編《民報》時，即開始講授國學，四川留學生前往聽者不少，三十年代初任四川大學校長的任鴻雋就是其中之一。其後一直堅持下來的有永川鍾正楙（稚琚）和墊江李植（培甫）等人。……〔還有〕章氏在東京的另一弟子中江李蔚芬（炳英）……一九三五年後，章太炎主辦章氏國學講習會於蘇州，入會的四川人不少，據說辦了一個川味伙食團。江津周光武、綿竹傅平驤、南充李恕一等均是當時弟子。<sup>29</sup>

後來他們長期從事教育工作，多半傳章氏之學。由於章氏弟子中四川人不少，先生甚至於主張辦了一個川味伙食團。

先生學習、生活片斷，據先生的同學湯炳正先生回憶：

當時，全國各地來此就讀者百餘人，限於條件，學會只供住宿，不辦伙食。一次我們在小食店就餐，發現炒菠菜中有蚯蚓，乃紛紛自組伙食團。如四川同學李源澄等，在外面成立了專吃辣味的伙食團；我跟一些北方人，也成立了專吃麵食的伙食團。我們輪流管廚。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六日，太炎先生開始講課，講過「小學略說」、「經學略說」、「史學略說」、「諸子略說」、「文學略說」；專書講過《尚書》、《說文》等。我們聽講的學生，每聽完一次講，就三、五成群，互對筆記，習以為常。因先生浙語方音極濃，我開始聽講，很感吃力，後來才習慣。先生有時召集諸生在他的客廳中座談；個別學生有求問者，亦可隨時單獨拜謁，談論學術。我是單獨拜謁最頻繁的一個。世傳先生與他人論學，鋒芒逼人，毫不寬假；但與吾輩後學相對，則是另外一副面貌。我們完全可以縱意暢談，無拘束感。……

先生治學，門戶極嚴，但交遊殊廣泛。他對學生學術以外的活動，亦頗寬

<sup>29</sup> 李潤蒼：〈章太炎與四川〉，載四川大學學報編輯部、四川大學歷史系編輯：《四川地方史研究專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頁75-76。

鬆，不甚約束。我當時課餘之暇，也曾訪問過陳石遺、金松岑諸名流。記得四川同學李源澄曾約我訪過畫虎名家張善孖。見他家竟馴養一隻大虎，供揣摩臨摹之用。虎在主客間遊玩自如。客見多驚愕，而主家老小與之相處無間。據說張君外出，多將虎載於後車相隨，如侍從之扈駕。<sup>30</sup>

### 1936年 民國25年（丙子） 28歲

一月，先生發表〈與陳柱尊教授論諸子書〉，與友人陳柱先生討論諸子之學。

應江蘇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校長唐文治先生之邀，先生任教於該校，講授諸子，從此開始了教學生涯。

曾在該校肄業三年的學生回憶說：

唐老先生為辦好「國專」，請名師授課。當時，各種學派之間，謹守門戶，互相排斥，不能相容。老先生無門戶之見，不論是何學派，只要在學術上有卓著論述者，皆欲禮聘羅致，廣攬人才。<sup>31</sup>

由此可見，唐文治先生辦學的襟懷寬容，頗值稱頌。

先生在國專，與教員錢仲聯（1908-2003，原名萼孫，號夢苕，一九二四年考入國專，始師從唐文治等研習經史諸子及《說文》等學，一九二六年以第一名畢業）先生相善。

當時學生張尊五先生在〈三十年代的無錫國專〉一文回憶道：

一九三四年以後，又有常州顧實（惕生）講中國文學史、文學批評史等課，虞山錢萼孫（仲聯）講中國韻文選，四川李源澄講諸子，巢縣魏建猷講中國通史。在此時期，各地來校聘請畢業同學任教師者日多……。<sup>32</sup>

三月，南京《國風》雜誌記者、契丹研究專家厲鼎燿（1907-1959）在訪問章氏國學講習會後，發表了一篇頗有影響的報導，其中有以下段落：

湯夫人詢悉來意，乃以《講演紀錄》十二冊，《叢書續編》單行本二冊見詒，並為述會中概況，慈祥懇摯，信能相大賢，迪後昆也。會中大師演講，

<sup>30</sup> 湯炳正：〈憶太炎先生〉，載陳平原、杜玲玲主編：《追憶章太炎》，頁456-467。

<sup>31</sup> 葉勁秋：〈唐文治老先生的辦學精神〉，《無錫縣文史資料·人物專輯（一）》第8輯（1990年），頁32。

<sup>32</sup> 載《江蘇文史資料選輯》第19輯（1987年），頁158。



週凡二次。第一期學程已講畢，其中《史學略說》、《文學略說》二科，筆記擺印未竣，其詳不可得而窺。《小學略說》、《經學略說》、《諸子略說》三種，則已由高第弟子王乘六、諸左耕二君筆錄成冊，並皆深入顯出，多獨到之粹語。今後課程，則如下表：

第二期 說文 音學五書 詩經 書經 通鑒紀事本末 荀子 韓非子 經傳釋詞

第三期 說文 爾雅 三禮 通鑒紀事本末 老子 莊子 金石例

第四期 說文 易經 春秋 通鑒紀事本末 呂氏春秋 文心雕龍

編訂旨趣，見於〈覆李續川書〉，其略曰：「以此時間，欲令人盡解經義，仍不可得；要令得其大略，為將來精進地步，非謂兩年畢業，已成通儒也。四期以經為最多，史雖只舉《紀事本末》，篇幅已不少。若欲盡講《通鑒》書，日力更有不及。如只講《史》、《漢》書，亦嫌其偏缺。至《史通》、《文史通義》之流，只以供人大言，而於歷史知識書不具。陳石遺始以《通鑒紀事本末》講解，審思亦不能易也。諸子之學，在今日易滋流弊，文章之學，本非講解可了，初意不欲列入。以學者意有未厭，故列子書六種及《金石例》、《文心雕龍》，以應其求。《文心》徒講亦鮮益，《金石例》分有實事可依者爾。」續川者，廖平門人，而又聞劉先生之教者也。（原書未刊，茲錄底稿）聞春假後課表更新，除先生自講外，復延朱君邊先講史學，馬君竟荃講經學，更由孫君鷹若講小學，張君復齋講訓詁，為補充科目，並有讀書硬功，《周易》（紹君講授）、《毛詩》（孫鷹若）、《爾雅》（汪青在）、《通鑒》（王心若）、諸子（王佩諍）、《文選》（諸左耕）、《文心》（諸左耕）七科。學員至少須選習補充科目六種，其根柢深厚者，傅平驤、湯炳正、金德建、陳兆年等十餘人，則准予免習云。……

自幸靜聆一席話，勝讀數年書矣。往時籀誦先生著作，氣象巖巖，若不可響邇，孰知躬親罄欵，其溫恭乃爾。蓋先生近抱利他主義，故樂接後生。雖康、廖門人，亦不之拒。觀其〈與錢玄同書〉曰：「僕每每抱常善救人，故無棄人之志。況今道術陵夷，此曹尚惓惓不肯舍去，與之共學可也。」可知其比來襟懷恢蔚，宏為廣大教化主矣。猗歟休哉！<sup>33</sup>

<sup>33</sup> 厲鼎燿：〈章太炎先生訪問記〉，原載《國風》第8卷第4期（1936年4月），頁132。此轉引自陳平原、杜玲玲主編：《追憶章太炎》，頁494-496。

從文中所言「廖平門人，而又聞劉先生之教者」看來，太炎先生對李續川（字崇元）、先生等今文經學的大度相容，得到了輿論界的贊同。

五月，先生發表〈與陳柱尊教授論公羊學書〉，與友人陳柱先生討論「公羊學」，即《春秋公羊傳》的相關學術問題。

六月十四日，章太炎先生去世。學會照常進行。由章門大弟子負責教學，章夫人湯國梨先生（1883-1980，字素瑩）負總責。先生從章太炎先生請教學問，受到了很大的影響。

七月，為了紀念太炎先生，先生發表〈章太炎先生學術述要〉，概述了太炎先生的學術貢獻。

本年，先生《諸子概論》一書由開明書店出版，該書先研究先秦儒、道、墨、法諸家思想及其根源，並評論《論語》、《孟子》、《荀子》、《道德經》、《莊子》、《墨子》、《商君書》、《韓非子》等書儒經的意義及價值。

### 1937年 民國26年（丁丑） 29歲

一月，先生在無錫，以個人在無錫國學專修學校薪資所入，創辦學術刊物《論學》。《論學》創刊號的版權頁的編者即是先生，通信處是「江蘇無錫國專李源澄收」，第一期有〈發刊辭〉和論文五篇，先生除撰〈發刊辭〉外，還撰寫了〈周秦儒學史論〉、〈新儒學派發微〉等論文二篇。其他的文章還有章氏弟子、師弟陳兆年先生（即上年南京《國風》雜誌記者厲鼎燐報導太炎先生認為「根柢深厚」、「准予免習」的弟子）所撰〈形聲釋例〉等。

《論學》的出版，得到先生師兄弟的支援，這些師兄弟分為兩部分：一是在四川國學專門學校的同學，如在一起就讀於該校的師兄呂洪年，寄來了〈宋教仁先生事略〉等文章，先生在《論學》第四期發表等；二是在蘇州求學於章氏國學講習會的同學，如陳兆年、沈延國、湯炳正、姚奠中等眾多章氏弟子的支持，這些章氏弟子的文章，皆載其刊。《論學》共出版了八期，蒙文通、歐陽漸、邵瑞彭、張森楷（1858-1928，字元翰，號式卿）、伍非百、唐君毅等先生亦有鴻文發布該刊。

春，先生在無錫，將主編的《論學》雜誌第一、二、三期寄贈北平清華大學的教授吳宓先生，吳宓收到後於四月六日覆函先生，表示謝意（《宓》第6冊，頁102）。

五月，先生發表〈讀經雜感並評胡適〈讀經平議〉〉一文。胡適〈讀經平議〉

一文撰於四月十四日，載於十八日天津《大公報》，又載二十五日《獨立評論》第二三一號。胡適提倡整理國故卻反對讀經，尤其是反對湖南省主席何鍵等人在國民黨三中全會上提出議案，倡議明令全國讀經。作為自由主義者的胡適，自然要反對。

同月，蒙文通先生撰寫的〈與李源澄論北宋變法與南宋和戰書〉一文，在《論學》第五期發表<sup>34</sup>。

六月十六日，先生偕師弟陳兆年先生，專訪吳宓先生於清華大學。時先生下榻於北平西單興隆街二十一號張宅（《宓》，第6冊，頁148）。吳宓在日記中記道：「李君〔即先生〕體胖，年少，精強。編輯《論學》月刊，甚為熱心。談甚歡洽，並導觀校舍。在此晚飯。並送登七點汽車，入城去。〔李、陳二君現年二十八九歲〕」（《宓》，第6冊，頁148）。這是《吳宓日記》中對先生的首次記載。

六月十九日，吳宓先生專程進城，於王府井大街承華園飯莊，宴請先生以及「陳兆年、王蔭南、湯用彤、賀麟。陳兆年未到，夜八時多席散」（《吳宓日記》，第6冊，頁150）。王蔭南先生（1905-1944，名汝案）是流亡北平的愛國詩人，湯用彤先生（1893-1978，字錫予）時為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兼主任，賀麟先生（1902-1992，字自昭）係吳宓先生的學生，時為北大哲學系教授。

六月二十一日，先生於下午專訪吳宓先生於清華大學，吳宓先生陪同先生前往拜謁老輩學者、北大及燕京大學教授張孟劬先生（1874-1945，原名采田，後改爾田）：「宓偕李君步行至王家花園，謁張孟劬先生（爾田），暢聆教誨。五點，李君別去。」（《宓》，第6冊，頁152）。

張爾田先生對於先生的學問，頗為稱讚，曾說：先生之學，「如開封鐵塔，不假輔翼，直上干霄」<sup>35</sup>。

六月三十日，先生於下午六時在中央花園春明館，與陳兆年先生，等候專程進城的吳宓先生，三人暢談甚歡，之後晚餐（《宓》，第6冊，頁159）。

七月初，先生將友人、現代著名佛教學者王恩洋先生所著的《人生哲學》一套四冊寄贈吳宓先生。十二日，吳宓先生在清華大學收到，「一部四冊，煌煌名著。

<sup>34</sup> 《論學》第5期於1937年5月在江蘇無錫印行，該文後經文通先生哲嗣蒙默先生整理，收入《蒙文通文集·古史甄微》（成都：巴蜀書社，1998年），卷5，頁399-401。

<sup>35</sup> 張學淵主編：《賴高翔文史雜論》，下冊，頁356。

宓之廢事耗神，殊可恨可傷也」（《宓》，第6冊，頁167）。

是年（七月之後），因抗戰軍興，先生在無錫的教學與主編等活動被迫中止，《論學》雜誌被迫停辦，先生輾轉返回四川省，似在四川省南部的宜賓敘屬聯中執教。其時應不長，後在成都，又任教於蜀華中學及四川大學。

程千帆先生說：「那時人的觀念中，大學和中學在社會地位上沒有什麼區別，而且以收入而言，中學還比較多。」<sup>36</sup>

十一月，日軍侵占無錫前夕，唐文治先生率領無錫國專全校師生內遷，後輾轉到達桂林。

十二月，先生友人韓文畦先生（1895-1983，字孟鈞，一九二四年任省二女師國文教習）在成都創辦了《重光月刊》（*Chung-kuang Monthly Journal*），先生與友人、成都華西大學講師唐君毅先生、周輔成先生任編輯，第一期本月出版並發行，發表有龔道耕先生（1876-1941）〈《字林》補本存疑〉等論文。《重光月刊》共出版了六期，對民眾積極宣傳抗戰救亡意識，更兼弘揚學術文化精神。

十二月，歐陽漸院長率支那內學院內遷四川江津，次年春支那內學院蜀院建成，繼續講演佛學，培育人才。

### 1938年 國民27年（戊寅） 30歲

四月二十二日，先生在四川省南部的宜賓敘屬聯中，完成了〈高中國文芻議〉一文的撰寫，六月發表於《重光月刊》第六期。

本月，《重光月刊》第三、四期合刊出版。

蒙文通、唐君毅、龔道耕等先生為《重光月刊》撰寫了多篇論文。如四月，國立四川大學教授蒙文通先生的〈周代學術發展之三時段〉、〈尚書之傳寫與體例〉二文，發表於《重光月刊》第三、四期合刊<sup>37</sup>；六月，蒙文通先生的〈墨子之流變及其原始〉一文，發表於《重光月刊》第六期；唐君毅先生也在《重光月刊》連續發表〈抗戰之意義〉（第一期）、〈中國哲學中天人關係論之演變〉等多篇論文

<sup>36</sup> 程千帆口述，張伯偉整理：〈勞生志略〉，載《程千帆全集·桑榆憶往》（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卷15，頁25。

<sup>37</sup> 係20世紀30年代至50年代蒙文通先生執教於國內各大學講授「中國史學」一課之講義，其基本部分撰於1938年任教成都時。參蒙默：〈序言〉，蒙文通：《中國史學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第一、二期）、〈中國教育應有之改革〉（第二期）、〈論中西哲學問題之不同〉（第三、四期合刊）等；還有龔道耕先生的〈鄭君年譜〉等論著（連載於第三、四期合刊、第五期、第六期）。

六月，先生與友人唐君毅等先生苦心經營的《重光月刊》停刊，共出六期。唐君毅先生在五月十六日的一封信函中說：「至於我對於國家民族，我想在文化與教育上貢獻我的力量，關於這點說來話長，以後再說。在最近我能做的事，只是辦《重光月刊》，辦此刊貼錢貼精神不少，也算我對國家民族所盡的一些責任。」（致廷光第一封書）。

八月十九日，西南聯合大學教授吳宓先生從雲南蒙自致函周炳琳，推薦繆鉞先生為浙江大學教授。不幾日後，浙江大學國文系主任「郭斌齋君又電聘鉞為浙江大學教授焉」（《宓》，第6冊，頁348）。學衡派的後起之秀郭斌齋（1900-1987）與吳宓交往甚密，往來函極多，除了推薦多人往浙江大學為教員外，吳宓先生也有自己亦「願來浙大為教授」，即移席浙大的打算，而郭斌齋亦有「時危可逕到」浙大之語（《宓》，第7冊，頁193；第8冊，頁345）。「郭斌齋君又電聘鉞為浙江大學教授焉」，只是繆鉞先生已經就聘四川省立江安中學教員（《宓》，第6冊，頁348、360）。十月，繆鉞先生方應郭斌齋先生之邀，就聘到校，為浙江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本（八）月，彭舉、蒙文通、韓文畦等先生到江津，赴內學院蜀院法會<sup>38</sup>。

九月，先生致函在雲南蒙自的吳宓，告以自己近況；二十七日，吳宓收到來函，得知先生「現任成都錦江街蜀華中學教員；並悉《重光月刊》業已停辦，僅出六期，殊可惜，蓋此為抗戰以來所出雜誌之最佳者，中載馬浮先生論學書，尤圓滿精到。另存記。附唐君毅寓址（成都長順上街一五五號）」（《宓》，第6冊，頁357）。馬浮先生即浙大教授馬一浮先生（1883-1967），名浮，清季舉人，次年夏為教育部設復性書院院長。

秋，王樹椒先生（1919-1945，字慧生）考入國立浙江大學史地系。上年秋，劉操南先生（1917-1998，字肇熏，號冰弦），也考入該系，王樹椒屢受歷史學教授張蔭麟先生（1905-1942，自號素癡）的讚許（徐規：〈我所認識的劉學長〉）；以後，王樹椒的文學、史學才能，更受到了繆鉞先生、先生的讚賞。

<sup>38</sup> 彭鑄君：〈彭芸生年譜〉，《崇慶縣文史資料選輯》第5輯（1988年），頁40。

十月，蒙文通、韓文畦、彭舉等先生同赴江津支那內學院，拜謁老師歐陽漸先生。

本年，先生仍在成都，執教於蜀華中學。

本年，浙江大學西遷廣西宜山。

### 1939年 民國28年（己卯） 31歲

浙江大學西遷貴州遵義，先生就聘為浙江大學史地系教授，因而前往遷到遵義的浙江大學教書。

同年，蒙文通先生任教於東北大學歷史系，時該校內遷於四川三台。

冬，中央民族文化書院在雲南大理宣告成立。書院係張君勳先生、國民政府委員會侍從室第二處主任陳布雷（1890-1948）等人創辦，設於雲南大理（今大理市洱海西岸才村城邑中學所在地），張君勳任院長，陳布雷任董事長。董事有張群、朱家驊、周煌甫、盧作孚、張公權、周鐘岳、張道藩等。上年初，張君勳先生在武漢出席國防參議會時，蔣介石曾讓人詢問他擬辦理何種事業，張告以志在力學；不久，武漢失守，張君勳隨國民政府遷到重慶，開始籌辦書院，至此，書院得以成立<sup>39</sup>。

張君勳創辦民族文化書院，親撰〈民族文化書院緣起〉，就書院成立的理由、宗旨、德性四綱、治學方法和研究工作作了介紹和說明。他以北宋哲學家張載所說「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說明書院的宗旨。這與他此前在廣州創辦學海書院一樣，重在實踐宋明講學傳統，弘揚中國傳統文化，重振傳統書院制度下的人格與生活教育，以培養現代新儒家的接班人。該書院與勉仁書院、復性書院齊名，成為抗戰時期的三大書院之一，堪稱是現代新儒學發展歷程中的大事件<sup>40</sup>。

先生見民族文化書院為兼具傳統書院與現代大學研究院之長，而且該院的開辦理由、宗旨等主張，也與先生的一貫主張，有不少相近之處。因而，先生就聘為中央民族文化書院教授，暫時仍在遵義浙江大學。

<sup>39</sup> 鄭大華：《張君勳傳》（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329。

<sup>40</sup> 同前註，頁333-334。



**1940年 民國29年(庚辰) 32歲**

三月，《史學季刊》創刊於成都，並編輯出版第一卷第一期。該刊由內遷西南各省的十多所高等學校歷史學系教授顧頡剛、徐中舒、呂思勉、朱謙之、李思純、吳其昌、吳晗、吳天墀、周予同、彭舉、聞宥、蒙文通、蒙思明、蔣天樞、錢穆、雷海宗、譚其驤、鄺承銓、陶元甘等七十餘人發起創辦，並以此作為籌辦成立「中國史學會」的先聲。顧頡剛先生為實際主持人，先生為發起人之一（第一期雜誌封面內頁印作「李源澄」），該刊通訊處為「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顧頡剛」，編輯為蒙文通、周謙沖二先生。次年三月停刊，共出版兩期。

四月初，先生在遵義致函在昆明的吳宓先生，告以近況。八日，吳宓覆函（《宓》，第7冊，頁152）。

六月，先生致函吳宓先生，共同推薦好友吳芳吉先生（1896-1932，字碧柳，別號「白屋詩人」）之次子、富順縣中學教師兼教務主任吳漢驥先生（1918-1979）為浙江大學助教。二十三日，吳宓先生致函郭斌龢，言此事（《宓》，第7冊，頁182）。由於多種原因，此事未成，漢驥先生後任《江津日報》總編、江津女子中學教師、勉仁學院國文教員。

七月一日，彭舉先生到達雲南大理，任民族文化書院教授。彭舉先生係三月辭川大聘，五月二十四日自成都起身的<sup>41</sup>。

八月，繆鉞先生就聘，為浙江大學中文系教授。

秋，徐規先生（1920-）從浙江大學龍泉分校來到西遷貴州遵義的浙大總校，從中國文學系轉入史地系繼續攻讀。當時史地系薈萃多位很有名望的教授，除了先生之外，還有張蔭麟、譚其驤、方豪、陳樂素、錢穆等。特別是張蔭麟先生開設「中國通史」、「中國上古史」、「唐宋史」、「歷史研究法」等課程很吸引徐規先生，他還指定徐規先生讀《史記》、《資治通鑑》、《宋史紀事本末》等書。徐規先生回憶說：「我那時愛寫史評文章，曾送請李師〔即先生〕批閱。他告誡說：『你的議論文寫得還不錯，但今後應撰考證文章，要務實，勿尚空談。』並介紹讀《日知錄》、《廿二史劄記》。讀後頗受啟迪。」<sup>42</sup>徐規先生還回憶說：同學王樹椒「屢

<sup>41</sup> 彭鑄君：〈彭芸生年譜〉，頁40。

<sup>42</sup> 徐規：〈自述〉，《蒼南文史資料》第10輯（1995年），頁30；又見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辦公室編：《中國社會科學家自述》（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頁832-833。

承國史教授張蔭麟先生、李源澄先生的讚許。惜王學長英年早逝，未盡其才」。

秋，民族文化書院正式開學。先生仍在遵義浙江大學執教。書院共分四個系，即經學系、史學系、社會科學系、哲學系，在重慶、成都、昆明、香港等地招生，招生對象主要是大學畢業生和具有同等學歷者。學制為二年，但可縮短和延期。其研究有相當成績，並提出著述者，經審查合格，發給推薦證而不發文憑。為保證學院的教學品質，張君勛想法聘請到不少知名學者，除先生之外，還有回國任教的哲學家、美國南加州大學哲學博士施友忠先生 (1902-2001, Vincent Y. G. Shih)、牟宗三、彭舉、陳慶祺（經學大家、章太炎的同學陳漢章先生之子）等。

十一月下旬，民族文化書院舉行董事會，討論預算等案。

約本年，先生出謀獻策，幫助兩位浙江大學女生、共產黨員王先謙、王□，使二人免於國民黨的捕殺。吳宓先生記載說，「浙江大學女生王先謙、王□二人，蓋共黨而為國民黨捕殺者，（先生）勸其重生」（《宓續》，第3冊，頁184）。

本年，蒙文通先生任四川大學和華西大學的教授。

### 1941年 民國30年（辛巳） 33歲

一月二十七日，應校長竺可楨先生之邀，先生作了題為〈學問與學問方法之解釋〉的演講，先生「謂學問者，必有方法云云」<sup>43</sup>。

二月，浙江大學史地等系再遷貴州遵義。

約在年初，先生辭去浙江大學的教職，出發前往大理民族文化書院執教。先生在浙江大學執教時的學生王樹椒先生，亦因先生之薦，就聘於民族文化書院。

三月底或四月初，先生在成都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由主持的錢穆先生之邀，與新錄取研究生洪德輝談話，勸導勉勵後者。洪德輝回憶說：

1941年3月26日午前，成都的春天，日麗風和，菜花盛開，香遍四野。我由傳達導進賴園，錢先生已早在會客室待見。……我才進研究所兩三天，便毅然到鶴鳴園亭中錢師做學研工作的座前，簡要陳述我對當前文史研究工作務切今日救亡圖存、學尚實用的淺陋看法。錢師聽後，溫和敦厚地微微點頭，未加可否。

次日上午，請來四川大學講師李源澄先生（成都人，是章太炎先生的弟

<sup>43</sup> 《竺可楨全集》（日記第3卷）（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卷8，頁9。

子)，在錢先生處寬坐，然後請我去談話。李先生和悅、敦厚的風度，溫和的語調，好意殷殷對我勸導，內容大要是：「你不遠千里來到成都，能從錢先生研學，是難能可貴的。錢先生講的是歷史考證之學，學術致用是廣大的、深遠的。」……我當時青年氣盛，意志堅決，堅定不移地說明：「思陋為學目的，當前要救亡圖存，將來要建好祖國，改好世界。」「進入研究所，意在爭取對問，早日寫成教材，用之於學校，普及於全民，感發人人，眾志成城，驅逐強寇，復興祖國，早收成效。這是區區夙夜殷切的願望。」源澄先生仍是好意殷殷、和悅敦厚的常態，溫和的語調，重複他的好意。而我仍是堅定不移，重複我的決心。談話近兩小時，源澄先生每次談一會，又沉默一會，然後又繼續談話。最後，源澄先生見我發言由衷，他感動見於表情地說：「洪先生這樣堅定的意志和毅力，相信你將來一定能寫好這套書，達到你『救國』、『救世』的目的。」至此，談話才告結束。源澄先生當時對我的囑望是重大、深遠的，我至今垂老，猶感念不敢忘懷。<sup>44</sup>

六月，郭斌龢主編的《國立浙江大學文學院集刊》在遷徙地貴州遵義創立，並發刊（年刊性質）。先生在該刊發表史學論文〈漢代賦役考〉。同刊的還有梅光迪所撰〈卡萊爾與中國〉、繆鉞〈周代之「雅言」〉等文。

約在本月或者下月，先生曾回到四川。浙江大學中文系教授繆鉞先生在本年有詩〈送李源澄歸蜀〉：「君家岷江畔，六月歸帆穩。遠遊山自青，不采蘭何損。涉世魚忘湖，績學葉歸本。環中得天倪，群言泯畦畛。余同偃蹇姿，識君已苦晚。素心味酒醇，遐情自崖返。喪亂憂弘多，夢魂勞繾綣。各保平生懷，馨香盈九畹。」<sup>45</sup>

七月，先生率領學生王樹椒、劉元熙（王樹椒之未婚妻），前往昆明等地訪友。老友、西南聯大教授吳宓先生得知，王樹椒，李之高足也（《宓》，第8冊，頁136）。抵達昆明後，先生下榻於城內靛花巷三樓。十七日下午，先生到城外拜訪吳宓先生，並在吳宓陪同下往訪教育系副教授王維誠先生（1904-1964，西南聯大儒學會發起人）之宅，之後同往西南聯大儒學會，本擬請先生演講，臨時「改為

<sup>44</sup> 洪德輝：〈從錢師（穆）在蓉研學生活的回憶〉，載江蘇省無錫縣政協委員會編：《錢穆紀念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頁59-60。

<sup>45</sup> 繆元朗、景蜀慧編：《繆鉞全集·冰蘗庵詩詞稿》（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卷8，頁39；繆元朗：〈繆鉞先生生平編年（1904-1978年）〉，載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編：《魏晉南北朝史論文集》（成都：巴蜀書社，2006年），頁57。

談話。多論述歐陽竟無、熊十力、馬一浮、梁漱溟諸先生之講學、為人大旨」。結束後到王維誠宅晚餐，並約二十日再會後再散（《宓》，第8冊，頁128）。儒學會係一個純學術民間團體，多次邀請吳宓、湯用彤等先生作儒學與中國文化等專題演講，如吳宓就在上年七月演講「世界文化之四大宗傳，儒學對今後世界之價值」，西南聯大學生可以自由參加，自由討論（《宓》，第7冊，頁198）。

七月二十日，吳宓應約拜訪先生，閱覽先生手抄史書稿本多冊，先生並贈以馬一浮先生《復性書院講錄》一冊；此後數日，先生與吳宓往來，宴飲、出遊、茗敘較多（《宓》，第8冊，頁132、133、136、138）。

約八月，先生到大理。本月二十日，彭舉先生自大理起程，十月二日抵成都。

先生在民族文化書院，主要講授史部課程，彭舉先生則講授經、子等部的課程，而院長張君勱除主持學院的日常工外，也為學生講授宋明理學、西洋哲學史課程。

此時，大理還有汪懋祖先生（1891-1949，錢穆友，原蘇州中學校長，白話文反對者之一）主持的國立大理師範學校等學校，先生與汪懋祖善。

夏，王樹椒先生離浙大轉雲南大理民族文化書院。

民族文化書院對於當地白族文化的研究及保護，產生了良好的影響。這與先生的學生王樹椒先生有關。王樹椒先生意外地在大理宏圭山（喜洲西面的蒼山腰有支突出山坡的俗稱）明代古墓群中，發現了鮮為人知的佛教銘文。

本年暑期，西南聯大歷史系教授雷海宗先生在給學校的報告〈歷史系拓碑計畫〉中說：「最近民族文化學院王樹椒君來書，謂大理蒼山之麓喜洲狗街西南發現荒塚兩處。一處墓碑約五十，佛幢數十。一處墓碑約百五十，經幢百餘，經幢上似為梵文，隱約可辨。碑前為墓誌銘，碑陰為梵文，亦有正面刻梵文，碑陰無文字者。皆明中葉以前物，且皆為《滇南古金石錄》及《滇南碑集傳》志書所未著錄。除此集中一地墓碑二百外，蒼山之麓碑幢林立，據王君估計，總數當在兩千左右。惜多為梵文，無人注意，碑多完好，未有拓印痕跡。按大理為南詔故地，盛行佛教，且佛教與中土不盡相同。此種碑幢，對南詔宗教史，以至政治史之研究，當可不無裨益。」<sup>46</sup> 雷海宗先生計畫擬在當年之內，摹拓塚側墓碑兩百種，「此項計畫如能順利進行，將來可設法摹拓梵文經幢，惟此非有梵文與佛學專家主持不可，而

<sup>46</sup> 載《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料》（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卷3，頁548。

且梵文經刻每多重複，需經鑒別，故此事費財費力，不是歷史一系所能勝任，擬應由校方統籌推進」。

在王樹椒先生的呼籲下，各方積極關注。次(1942)年暑期，西南聯大歷史系學生石鍾健(1913-1991，又名石鐘，後來成為中央民族學院教授)等人來到喜洲，用了近一個月的時間，搶救性地收集到一五〇通碑銘(包括三塊白文碑)，使學界對白文、大理密教的來源、傳入傳播情況，以及民家即白族的族源等重大學術問題有了全面的認識；石鍾健後來寫成〈大理喜洲訪碑記〉一文。因而，石鍾健、王樹椒先生在白族學術史上，也占據重要的一頁。

十二月，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孔祥熙家人用國民政府派到香港撤退人員和物質的飛機運洋狗到重慶，消息傳出，引起西南聯大學潮。「洋狗事件」後，民族文化書院院長張君勱因而被當局指控為幕後指使者；兼之本年張君勱「促進民治」的政治熱情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不滿，民族文化書院的發展受到制約。

本年，先生為研究佛學並開始撰寫《唯識綱要》的友人田光烈先生(1912-2007，名應炬，以字行)，介紹同學巨贊法師(歐陽漸弟子)聯繫切磋。時田光烈先生服務於四川古蔺縣的勉仁小學，一九四三年入支那內學院蜀院學習，歷任雲南大學、南京大學等校教授，一九四九年後成為南京金陵刻經處研究員、閩南佛學院導師。

先生與夫人周觀成女士(1904-1962，先生鄉人)<sup>47</sup>在本年初或者此前某年結婚，夫人長先生五歲，而長女李知勉於本年出生(《宓續》，第6冊，頁173)。案：《吳宓日記》記載，一九五八年夏，李知勉初中畢業，準備報考高中；一九七二年十一月，李知勉拜謁吳宓先生，吳宓先生記載道：「知勉今三十二歲矣。」則知知勉出生於本年(《宓續》，第10冊，頁238)。

本年，唐君毅先生創辦《理想與文化》期刊。

## 1942年 民國31年(壬午) 34歲

初春，國民黨當局藉院長張君勱到重慶出席國民參議會之機，將其軟禁。民族文化書院旋被當局下令關閉。張君勱在春夏之間，被軟禁於重慶汪山，達兩年之久。

<sup>47</sup> 先生夫人周觀成女士的生卒年，吳學昭女士在《吳宓日記續編》中注釋為西元1905-1969年，參見第3冊，頁283注釋。但是，根據《吳宓日記續編》的文中的記載，先生夫人的生卒年應為1904-1962年。詳見正文1962年年末條；或參考《吳宓日記續編》，第5冊，頁94、402、410；第10冊，頁238。



先生友人牟宗三是說：

大理民族文化書院不三年，因政治關係而解散。吾亦情至義盡，與國社黨之關係從此終止。（後改爲民社黨，吾即正式退出）吾返重慶北碚金剛碑勉仁書院依熊師。勉仁書院爲梁漱溟先生所籌設，熊師處其中，吾則間接依附也。勉仁諸君子對熊師亦大都執弟子禮，然精神氣脈則親於梁而遠於熊。吾與梁先生始終不相諧。吾雖敬佩其人，而不相契。勉仁諸君子視梁若聖人，吾益起反感。彼等於梁五十生慶，集文頌揚，吾以不解相辭，彼等函梁謂勉仁書院一切須待梁主持。（〈我與熊十力先生〉）

民族文化書院雖然開辦僅二年就停辦，存在的時間都不長，甚至沒有一個學生畢業。但是，它在現代新儒家的發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自從一九三四年張君勱與張東蓀（1887-1973，原名萬田，字聖心）在廣州創辦學海書院後，現代新儒家有了宋明自由講學傳統的第一次實踐。從此，創辦書院成了現代新儒家的主要活動之一。此外，民族文化書院對於當地白族文化保護、對於大理地方文化教育的發展，均產生了良好的影響。

初春，先生令在昆明的學生王樹椒，往謁吳宓先生。三月四日中午，王樹椒謁見吳宓於聯大宿舍，告民族文化書院解散，將隨先生赴成都（《宓》，第8冊，頁258）。汪懋祖先生撰〈大理民族文化書院記〉，記載學校始末，吳宓先生曾讀（《宓》，第9冊，頁37）。

春，先生偕老輩、民族文化書院同事彭舉，以及友人施友忠等先生返成都，再回四川大學執教。

先生在川大，講授經學，講稿整理為《經學通論》。彭舉先生是蒙文通先生的同窗，唐迪風先生的好友，回蓉後先在齊魯大學，後也在川大執教。一九四九年，由成都薛崇禮於民國三十八年校鐫出版了彭舉《清季四家詞》（半塘定稿），一冊，白紙線裝，約十六開大。五〇年代任新建重慶師範專科學校教授<sup>48</sup>。施友忠先生則任教於四川成都燕京大學。

春，蒙文通先生任四川省立圖書館館長。案：四川省立圖書館成立於一九四〇年四月十日，首任館長為曹祖彬。文通先生任館長期間，大力收集圖書，十年間入

<sup>48</sup> 向楚先生有〈病起懷人寄彭芸生教授重慶〉一詩，見《空石居詩存》（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88年）。



藏圖書十萬冊；又編輯《圖書集刊》，以刊布學者的研究成果，前後出版九期，撰文七十多篇，總計幾十萬字。

吳漢驥（「白屋詩人」吳芳吉次子）與周輔成、程行敬編輯的《理想與文化》，由四川廖聞天出版。

二月十四日下午，吳宓先生「作長函致浙大蘇等諸知友」，應含先生在雲南近況（《宓》，第8冊，頁249）。

先生再回四川大學執教，講授經學，因有《經學通論》之作，其言治經要義皆集於此，雖全編不過四萬言，而其議論則頗精湛且與時賢不同。

六月，四川省立圖書館編輯的《圖書集刊》第二期出版，先生在該期發表〈西漢思想之發展〉一文，同期發表的還有先生指導的學生王樹椒先生的〈西晉禁兵考〉一文。

九月九日，吳宓先生在昆明，閱讀先生近作〈西漢思想之發展〉一文後，表示甚佩（《宓》，第8冊，頁380）。

約本年，齊魯大學教授、國學研究所主任顧頡剛先生(1893-1980)借居先生成都寓所的一間，讀書治學。顧頡剛〈西廡讀書記〉：

西廡者，成都學宮之西廊也。時李源澄君居此，予因借一椽，為自修之地。其地入所不至，故頗得讀書，然予任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主任，為職務所困，亦不克常至也。是時予與履安皆多病，予血壓高至百八十度，時苦頭暈，履安則日瘦弱，不知其所患者為何。長女自明、次女自珍皆在成都，家中殊不寂寞。蜀中風物頗與蘇州相似，亦有隨遇而安之想。惟東望故鄉，終不免側側耳。<sup>49</sup>

顧頡剛〈駱園筆記〉記載：

予受齊魯大學聘來成都，賃屋於華西壩南門外之駱園，駱者主人之姓也。有室四間，以一間為書室。成都人文淵藪，得書較易，商討亦有人，視浪口村之窮僻大異。特予體多病，加以盜名久，賓客盈門，日有酬酢，其不能讀書又與在北平時同，此則心中之隱痛矣。承李源澄君之邀，借學宮為自修地，雖不甚便，而暫得清靜，亦復可喜。噫，年日已長，而體與學乃日退，奈

<sup>49</sup> 顧頡剛著，印永清輯，魏得良校：《顧頡剛書話》（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15。

何，奈何！<sup>50</sup>

本年，先生同學陶元甘先生擔任四川通志館採訪組組長，主持編寫《四川方志簡編》。

#### 1943 年 民國 32 年（癸未） 35 歲

二月二十三日（農曆正月十九日）辰七時，先生的老師歐陽漸大師在四川江津內院圓寂，享年七十二。

十二月，先生與弟子王樹椒先生的大作同在《圖書集刊》第五期發表，先生的論文為〈鄭注《周禮》易字舉例〉等三篇，王樹椒的論文為〈記「白古通」「年運志」〉一文。

#### 1944 年 民國 33 年（甲申） 36 歲

先生不滿於四川大學的校內派系鬥爭，萌生去意。

程千帆先生（1913-2000，原名逢會，改名會昌，字伯昊，四十歲後別號閑堂，千帆係其筆名）從一九四三年八月到一九四四年七月任職於四川大學，適與先生同；而程千帆先生則在同年七月後離開四川大學，原因亦與先生相近，他如是說：

我也是因為四川大學內部有些問題，……川大的先生中，有幾個是章太炎先生在日本講學時的學生，當時年齡也很大了。還有一位龐石帚（俊）先生，他是自學成材的。……當時蒙文通先生也還在川大，他也很有意思。……四川這個地方，一方面是外面的人根本不曉得四川的學者有多大能耐；另一方面，四川的學者還很看不起外面這些人。他看不起自有他值得驕傲的地方。<sup>51</sup>

秋，著名學者伍非百先生在四川南充創辦的西山書院，聘請先生執教，先生因而離開川大，而執教於西山書院，講授《四書》和《經學概論》，與伍先生講授《墨經》，均頗有影響。書院設有精修、博學兩班，學生一百人，學制三至五年，經費賴捐助、募集，學生入學，一般不繳費。此外，湯炳正、蒙文通、徐振羽等先生亦就聘為教授。

<sup>50</sup> 同前註，頁 16。

<sup>51</sup> 程千帆口述，張伯偉整理：〈勞生志略〉，載《程千帆全集·桑榆憶往》，卷 15，頁 21-22。

先生的《李源澄學術論著初編》一書，由成都路明書店出版。先生分贈林思進(1873-1953)等先生，林思進先生酬以〈李源澄惠《學術論著初編》，鄭異材亦以新詩見投，作歌贈李，兼用酬鄭〉一詩，云：

平原自說不失士，時見鹽車壓騏驎。李生積學久更真，使我文章坐奪氣。  
平生妄詡閱千劍，若論波瀾本無二。言之有物即載道，不在虛名驚譁世。  
愛君經史讀爛熟，推隱鉤沉抉奧義。我今衰謝鷗退風，君才勁捷隼刷翅。  
非欲爲我張一幟，頗思就君談兩蔽。紬史終當溯班馬，居巢譙釀忘忌器。  
窮經貴要別今古，施甸掘井迷甘味。人頭畜鳴能幾時，今有大帚掃霧翳。  
莫言興滅繼絕難，擔荷正是儒生事。開鑿戶牖總豪傑，循抹牆壁只兒戲。  
大海須爲眾水歸，泰山寧讓土壤細。蘭芷悅鼻不同臭，酸鹹爽口各異味。  
欲近四旁君但中，南北東西都可至。鄭生亦我心所許，詩歌寥亮鏗瓊佩。  
丹山早作鳳凰聲（《永甯方志》有丹山最名），谷口高貞此餘裔。望道爭  
策千里足，並轡即看一蹴致。老夫老眼不蹉跎，喜放斯人出頭地。詩成擱  
筆覺悲來，漫擬耄嗟托後契。<sup>52</sup>

林思進先生此詩，又為四川省瀘州市敘永縣《文史資料選輯》之〈敘永文鈔〉收錄，題為〈作歌贈李源澄，兼以酬鄭容若〉<sup>53</sup>。詩中所言鄭異材係敘永人士、四川大學文學院院長向仙喬嫡傳弟子，時為四川大學文學院講師。林思進先生以「愛君經史讀爛熟，推隱鉤沉抉奧義」讚賞先生的研究，並以「托後契」語對先生寄予厚望。

先生的專著《經學通論》由成都路明書店出版，先生認為「經學為中國文化之源泉」，「經學為吾國古代文化之總匯」（《經學通論·自序》）。先生弟子認為「其言治經要義皆集於此，雖全編不過四萬言，而其議論則頗與時賢不同」（蒙默：〈蜀學後勁——李源澄先生〉，《蜀學》特刊第2輯，頁48）。成都路明書店在民國中後期的烽火年代，連續出版了先生、梁漱溟、蒙文通、繆鉞等先生的學術專著，以及《理想與文化》（月刊）等有影響力的雜誌，頗為難得，如蒙文通先生的專著《儒學五論》（十一月）、繆鉞等先生的《文選與玉臺新詠》和《繆鉞文

<sup>52</sup> 林思進著：〈清寂堂詩續錄〉，《清寂堂集》（成都：巴蜀書社，1989年），卷7，頁515-516。

<sup>53</sup> 敘永縣編史修志委主編：《文史資料選輯·敘永文鈔》（1983年），頁272。

論甲集》等，亦本年由成都路明書店出版。

### 1945年 民國34年（乙酉） 37歲

春，先生在西山書院執教半年後，與伍非百先生在某些方面上意見不盡一致，故辭教職返回成都。

春，先生在四川灌縣城外北靈巖山創辦靈巖書院，邀請太炎弟子、師兄傅平驤先生任教。傅平驤先生在家鄉綿竹縣曾任女子初級中學校長，一九四〇年任綿竹縣民教館館長。

首批學生約有十名，後漸增加到數十人。學費為大米一石。

書院授學程度從初中到大學，主要講習經、子、史及文選。蒙文通先生不僅非常欣賞先生的學識，而且積極支持先生的書院事業，亦送哲嗣蒙默先生入書院就讀。先生並讓胞妹培華女士、胞弟源委先生，傅平驤先生也讓自己的男公子、女公子全波女士，一同到書院讀書。

先生繼續講授在四川大學執教就已講授的《經學通論》，以及主講《論語》、《孟子》、《荀子》、《禮記》等儒家經典；傅平驤先生長於聲音文字訓詁之學，主講《詩經》與《說文解字》。此外，先生又經常邀請當時的著名學者來「靈巖書院暑期講習會」等做短期講學，雖學派有異，卻彼此尊重容納，大抵與章氏論學態度有關。同時，使書院學生在篤學我國傳統文化之外，更得博聞百科之學，廣知全世界人類文化的精神財富。

先生對於學生，愛若子女。靈巖書院崇慶縣籍學生鍾元靈，「家境清貧而好學，他不僅免去鍾的學費，還以自己所得稿費，資助其伙食」（〈先生傳〉，頁718）。

六月，在先生的指導下，高足王樹椒先生的論文〈北魏漢兵考〉發表<sup>54</sup>。

七月，老輩學者、川大及齊大教授彭舉先生專赴灌縣靈巖山訪先生，先生誠意留請彭舉先生山居近一月，晤談甚歡<sup>55</sup>。

本年，有天才之譽的王樹椒先生病逝，年僅二十六歲<sup>56</sup>。對於自己的愛徒，先

<sup>54</sup> 《文史雜誌》第5卷第5、6期合刊（1945年6月），頁82-84。

<sup>55</sup> 彭鑄君：〈彭芸生年譜〉，《崇慶縣文史資料選輯》第5輯（1988年），頁41。

<sup>56</sup> 熊德基：〈慟憶夭逝的天才王樹椒〉，載許淵沖：《追憶逝水年華：從西南聯大到巴黎大學》（北京：三聯書店，1996年），頁137。

生更是十分痛惜。「他為學生王樹椒不幸去世而傷心落淚，給友人去信曾說：『種樹尚為人愛惜，何況此生！』」（〈先生傳〉，頁 718。此處友人指賴高翔先生，見《賴高翔文史雜論》，頁 356）。

### 1946 年 民國 35 年（丙戌） 38 歲

先生在書院教學之餘，潛心撰述古代史研究專著《秦漢史》。

一月底，梁漱溟先生與先生及葉石蓀先生通函，商量籌備在昆明設立一個文化研究所，進行文化研究工作。

二月，錢穆先生為先生所撰專著《秦漢史》作序，序言在略疏清代大學者章實齋先生記注、撰述、方智、圓神之義後，說自己「往者謬膺北京、清華諸校講席，授秦漢史，草為講義，及新莽而止，其下未遑繼續，悶之筐衍，逾十餘歲矣」；接著提到「今年春，李君浚清自灌縣山中來，出示其新著《秦漢史》一編」，稱讚讀過該書後「有幸與鄙見相合者，有鄙見所未及者，私自忖之，浚清其殆今之所謂善讀史耶，其書則亦章氏所謂圓而神之類也」。錢穆的序言，以章實齋所謂的「圓而神」而推崇先生史學研究的精深宏卓，可謂評價甚高。該書由先生次（1947）年最終定稿並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三月，先生於灌縣靈巖書院為自己的專著《秦漢史》撰寫自序，序言說：

六年前，在浙江大學授課，有《秦漢史》及《魏晉南北朝史》之纂錄，《魏晉南北朝史》多單篇發表。後在四川大學又講授《秦漢史》一次，其時為學興趣不在此，未有所增損。近年深感秦漢一段在國史上之重要，昔所纂錄猶有助於初學讀秦漢歷史，因繕理舊稿以成此編，較之初稿文字為簡約矣。初撰此書，原在便利學生，使之明瞭秦漢大事，再進而求之秦漢歷史。故人人所知者則不復言，即其關係甚大不能不言者，言之亦從簡略。若所關甚大而為人所忽者，則言之從詳。其中引用原書處，多是人所忽略處，乃以為徵信也。若人異義，則直言之。是若吾書各篇雖頗具經緯，屬辭則有愧撰著體裁。吾書所措意者，封建、郡縣、儒術三事，秦漢為封建變為郡縣之歷史，封建制度消滅，郡縣制度完成，儒術與君主結合，三者實秦漢歷史之中心。秦漢以後之歷史，則君主與儒生互讓之歷史，其利弊得失皆可於此中見之，竊願讀者勿忘斯意。又念吾纂輯此書之時，平心讀書而已，未敢有他志，殊不料所得與常論不同如此。吾於馬、班、范書猶病未能精熟，足見古人之蘊未經人

道者甚多，帝王家譜之說殆不其然，學者亦當知所先務也。民國三十五年三月李源澄自序於灌縣靈巖書院。

該書由先生最終定稿，並由商務印書館次(1947)年四月出版。

春，開明的自貢大鹽商余述懷先生(1883-1947)受到先生堅持不懈振興國學的感召，贊助了一筆辦學經費。為了讓更多的人有機會到書院學習，先生並開始籌備靈巖書院暑期講習會，報名地點在成都城的四川省圖書館(蒙文通先生任館長)，學費為大洋三元。

六月，內遷桂林的無錫國專遷回無錫復校。

夏，靈巖書院暑期講習會正式開學，學習期為暑假的二個月時間。報名來講習會的學生較多，約有二十餘人，一位崇慶縣四十多歲的老師帶著他的幾個學生一起來聽課，時哲學家、哲學史家唐君毅先生為內遷重慶的中央大學哲學系教授、系主任，應邀前來講學十餘天。

應邀前來講學的還有潘重規(1908-2003)、賴高翔、饒孟侃(1902-1967，外國文學研究家，新月派詩人)、牟宗三、謝文炳(1900-1989)、朱自清(1898-1948)、錢穆、張敷榮(1904-1998)、周輔成、秦佩珩(1914-1989)、羅念生(1904-1990，學名羅懋德，早年畢業於清華，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四年先後進美國俄亥俄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和康奈爾大學研究院、雅典美國古典學院學習、研究。一九三四年回國，歷任北京大學、四川大學、武漢大學、清華大學等校外語系教授)、劉盛亞(1915-1960，留德，進步文化救亡活動的參加者，編輯《中原月刊》，主編《星期文藝》，擔任《西方日報》副刊主筆)等先生，也應邀到書院講課。

如後來成為著名的經濟史學家的秦佩珩先生自述：

沉重的胃病，折磨著我的身體，在健康狀況還沒有改善多少的情況下，由於李源澄教授的邀請，我到灌縣靈巖書院去講學。李源澄先生除子學外，尚精於史學，對於《五經》、《四書》，亦皆有發明。青城靈巖之間，堪稱為博學之士。當時到靈巖書院來講學的人很多，如謝文炳、羅念生、朱自清、劉盛亞等，大都是些出頭露面的人物，我也忝列其中。我講的是「經濟史的研究和史部目錄學的關係」；事後想來，真是「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的感覺。當時朱自清先生講完以後，也和我一齊到青城山天師洞遊歷，他對我的講述，出乎意料之外地給了很好的評價。郭紹虞先生也寫信給我，聲稱接到朱先生的信，盛讚我的「學識淵博，人才難得」。我急忙回信給郭先生，



告訴他代為轉達朱先生「謬蒙推許，實為過譽，只有更加努力，以匡不逮」<sup>57</sup>。

《犍為縣志》之〈先生傳〉，稱先生辦靈巖書院「力求使學生於深山古寺之中，篤學躬行之外，而博聞古今中外之學」，敘述所指應即在本年：

〔先生〕在辦靈巖書院時，深得一批師友和靈巖寺方丈傳西和尚的支援，為其提供房舍和必要用具。來學的學生純係自願，畢業既無文憑，也不安排工作，惟有潛心學習。他主講《論語》、《孟子》、《荀子》等儒家著述，並請傅平驤講音韻學及《詩經》。他深知個人的學問是有限的，為使學生博聞廣見，常約請學有專長的學者上山講學，如潘重規講訓詁學，唐君毅、牟宗三講哲學，賴高翔講《陶靖節集》，饒孟侃講《神曲》，羅念生講希臘悲劇，錢穆講《近三百年學術史》，謝文炳講西洋文學，朱自清講文學，蒙文通講儒學等。力求使學生於深山古寺之中，篤學躬行之外，而博聞古今中外之學。（〈先生傳〉，頁717）

八月，梁漱溟先生在重慶北碚金剛鄉勉仁中學（梁漱溟一九四〇年創辦於璧山縣來鳳驛，次年秋遷來）中創辦勉仁國學專科學校。同年，梁先生撰寫《中國文化要義》。

十月，先生使用自貢開明大鹽商余述懷先生贊助的經費，創辦了學術刊物《靈巖學報》，是刊發行人為富順商人余次青（即東方文教研究院董事會會長），印刷者為華英書局，定價壹千伍百元，半年一期，係半年刊，創刊號（第一期）標明「靈巖書院（四川灌縣）」編輯。創刊號共有三十二頁，刊發了六篇學術論文。除了先生親撰〈天人合一說探源〉一文之外，還有蒙文通撰〈黃老考〉、〈楊朱考〉，王樹椒的遺著〈論兩漢魏晉用人標準之不同〉，唐君毅撰〈佛學時代之來臨〉和張德鈞撰〈胡子知言發微〉。這些作者除了王樹椒先生英年早逝之外，其餘的都是當時有一定影響的學者。

夏秋之季，靈巖書院開辦暑期講習會，延請名師，創辦學術期刊，影響日益擴大，這一時間，書院進入了鼎盛時期。

十月，錢穆乘飛機入滇，住昆明翠湖公園雲南省立圖書館內。錢穆來滇之時，

<sup>57</sup> 秦佩珩：《秦佩珩學術文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頁952-953；高增德、丁東編：《世紀學人自述》（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0年），卷5，頁78-79。

並代五華書院、雲南大學聘請先生前來任教。同時應聘前來執教的還有先生的師兄、章氏弟子、錢穆的好友諸祖耿先生等，錢穆先生在五華學院主講「中國思想史」。

本年，蒙文通先生在成都兼任私立尊經國學專科學校的校長，以培養國學人才。

約本年，王恩洋先生應先生之邀請而到書院。時袁煥仙等人都在此避暑清夏，與傅西等晤談甚歡。

### 1947年 民國36年（丁亥） 39歲

隨着上年六月內戰的全面爆發，靈巖書院好景不長。在渡過了鼎盛時期，開辦兩年多的書院步入困境。

四月，先生所撰的一部斷代史名著《秦漢史》由商務印書館，作為「復興叢書」之一種，正式出版。先生自視甚高，以為此著「所得殊與常論不同」（該書〈自序〉）。錢穆先生應邀為該書作序，錢穆以前在北大教授過《秦漢史》，對此知之甚深，以章實齋所謂的「圓而神」而推崇先生史學研究的精深宏卓，評價甚高。

秋，靈巖書院開辦兩年多後，因經費匱乏而難以為繼，被迫停辦<sup>58</sup>。

停辦靈巖書院後，先生與傅平驤先生不得不含淚下山，此後未得再返書院。書院辦學雖不足三年，但是為西南地區培養了一批人才，追隨先生的學生，後來成名成家的有多人，如：

王德宗先生（1924-，自稱無限齋老人），後在梁漱溟先生主辦的勉仁國學專科學校（旋改為勉仁文學院）就學，現任四川省宜賓學院中文系副教授、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顧問，著有《求是集》、《梁漱溟再讀》、《無限齋詩歌小集》、《無限齋散文小集》和《無限齋學術論著小集》。

屈仲樵先生（1924-1997），瀘州陵園中學的創辦人之一，並任教務主任，教授語文。先後在璧山、瀘縣、敘永等縣川劇團任編劇，精書道。著有書學論文集《書學》，詩詞集《屈仲樵遺作選》（童祥銘主編，瀘州市文化局、瀘縣文化局、瀘縣方洞鄉人民政府出版，1999年），係知名詩人、書法家、金石家，被譽為四川省

<sup>58</sup> 《瀘縣志·教育·科技》（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382。

「藝壇三屈」之一（著名藝術家屈義林、屈趁斯）。

蒙默先生，後在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四川大學歷史系工作，教授，知名歷史學家、民族學家。

王家佑先生(1926-)，書院暑期講習會就讀學生，後任四川省博物館研究員，參與三星堆早期的發掘與考古，先後投師於佛學大家袁煥仙大居士和青城山龍門派碧洞宗高道易心瑩門下，出版了〈四川船棺葬發掘報告〉、〈四川石窟雕塑〉、〈道教論稿〉、〈青城仙源考〉等專著，因而在文物考古民族史和道教史研究方面，成就卓越，是道教研究著名學者。

傅全波先生，傅平驤先生之女公子，後工作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汪克永先生（字有行），一九四四年時為華西大學哲史系學生，當年十一月參與了「成都市立中學事件」。一九四九年秋末，任青年黨中央黨部的機關報《新中國日報》的總主筆。解放後被任為四川省文史館特約館員。

當年在靈巖書院就讀的學生今大多已作古，他們之中的一些人早已成為卓有建樹的大家，比如中國道教協會顧問、道學泰斗王家佑先生，原四川總督丁寶楨的孫子、帖學大師丁季鶴先生……。

此外，書院的其他學生，也成為大學教輔人員（如李源委即李端深，一九四九年後任西南師範學院圖書館職員）、中小學教師（如前面提到的先生資助過的鍾元靈，家境清貧而好學，畢業後回崇慶縣教書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去世）等各行業對社會的有用人才。

先生下山後，同年，自號「工商夢醒人」的灌縣人士李濟余先生，捐資在靈巖書院舊址興學，親自任教，並自編《識字明理捷徑》一書為教材，內容有天時、地利、歷史、農業、住行、民族、宗教，以及人生哲學之類，靈巖山村農民子女五、六十人，皆免費入學。教育學生愛勞動，對學生不施體罰，一九五一年停辦<sup>59</sup>。

先生與傅平驤先生到達雲南昆明，在雲南大學執教。先生任史學教授，並兼錢穆先生主持的五華書院教授。

當時的雲南大學，同時有五位章門弟子執教：除了先生與傅平驤先生之外，還有老一代的劉文典，同時在雲大和西南聯大任教授，此外又有副教授諸祖耿、姚奠中先生。老友錢穆，作為就職於西南聯大的部聘教授，在聯大各校返遷北歸後，卻

<sup>59</sup> 同前註。

留雲大兼主編《雲南通志》，也常與先生過從。

先生在五華書院，講授《經學通論》<sup>60</sup>。

先生執教於雲大，對於學生一如既往，視若子女：「在雲南大學時，領了工資，總要約請隨他去昆明的學生到餐廳，改善一下生活。」（〈先生傳〉，頁718）。

先生在昆明生活的片斷，姚奠中先生回憶：

錢穆先生在昆明時，每喜擠出下午時間，約幾個朋友外出散心。那時在雲大執教的章門弟子，除劉文典不算外，還有四位。其中諸祖耿是錢老在蘇州中學教書時的老同事。李源澄，是錢老在歷史研究方面的摯友。而我和傅平驤，則因諸、李的關係，常和他們相聚於翠湖公園內雲南通志館錢老的寓所。除談學外，常被錢老邀到甜食館吃甜食。昆明甜食館不少，差不多都吃遍了。<sup>61</sup>

十二月二十九日，吳宓先生接到成都友人函，「言成都諸友對宓之關念」（《宓》，第10冊，頁300）。

#### 1948年 民國37年（戊子） 40歲

八月，著名儒學大師梁漱溟先生在重慶北碚溫泉松林坡勉仁國學專科學校（一九四六年八月創設）的基礎上，創辦私立勉仁文學院，熊東明為院長。先生受梁漱溟之邀，到北碚勉仁文學院，任教務長和歷史系教授。同時就聘教授的有鄧子琴先生（1902-1984）等人。勉仁文學院建於重慶北碚的縉雲山下北溫泉松林坡。梁漱溟自任董事長兼院長，他在本年寫的〈勉仁文學院創辦緣起及旨趣〉一文中，坦陳該院創辦目的在於「它是為要作當前文化問題之研究」，袒露了自己傳承中國文化的責任感、使命感<sup>62</sup>。學院成立有全院師生院務共進會，院內分設中國文學、歷史、哲學三個系，研究與教學並重。梁漱溟不僅為學院募捐甚巨，而且親自講授中國文

<sup>60</sup> 吳棠：〈憶五華文理學院的一段歷史〉，《五華文史資料》第5輯（1989年），頁63。

<sup>61</sup> 姚奠中：〈錢穆愛吃甜食〉，載華而實主編：《汾晉遺珠》（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頁62。

<sup>62</sup> 〈勉仁文學院創辦緣起及旨趣〉，見《梁漱溟全集》（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卷6，頁781。

化要義和心理學課程，直到一九五〇年應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電邀赴京。

先生在勉仁文學院執教及擔任教務長，積極主張兼收博覽，故除了梁漱溟思想體系外，亦積極建議延聘吳宓先生等著名學者，並在本年親自延聘了吳玄先生講西方美學，傅平驤、羅庸先生（1900-1950，字膺中，號習坎）講中國文學。傅平驤先生係先生從貴陽師範學院延聘而來。

先生在勉仁文學院教授的學生，後來成才者有多人，如靈巖書院弟子王德宗，也來勉仁文學院就讀；一九四八年就讀於文學院歷史系的張拱卿先生（1926-），後來成為了重慶圖書館古籍鑑定專家<sup>63</sup>。

先生的章氏同門師弟、雲南大學同事姚奠中先生，在本年先後到貴州省的貴陽師範學院、貴州大學工作，在弘揚傳統文化、發展教育事業領域亦有影響，故先生在勉仁文學院，曾與梁漱溟、熊十力等先生提到姚先生情況，引起梁漱溟、熊十力等先生的關注與認同。由此故，梁漱溟贈行書條幅，熊十力贈所著《新唯識論》，均囑先生托人轉給姚先生。

十二月八日，中央大學二年級修業生、四川省江津縣籍（今屬重慶市）青年黃哲明先生（1928-）在武漢拜訪吳宓先生，「來辭回四川，攜去其文稿」，吳宓先生「為作函介見梁漱溟、李源澄，請入渝勉仁書院肄業」，即介紹黃哲明入學於先生所服務的學校<sup>64</sup>。

#### 1949年 民國38年（己丑） 41歲

四月二十九日，吳宓先生從武漢飛赴重慶，任私立相輝學院外語教授，此次係應相輝學院院長許逢熙之邀。同日，吳宓「寫信與勉仁梁、李，要接宓」（《宓續》，第1冊，頁5），即要求勉仁文學院梁漱溟及先生來迎接，兼任私立勉仁文學院歷史系的教授。

此時，先生任勉仁文學院歷史系主任，時吳宓先生任歷史系教授，與同事、中

<sup>63</sup> 《梁漱溟全集·書信卷》收錄有梁漱溟致張拱卿的三封書信；又可參仇崢：〈張拱卿60年看書20萬冊還嫌少〉，《重慶晨報》2006年11月20日。

<sup>64</sup> 到了50年代中期，吳宓先生仍關心著黃哲明的近況，二人有來往（《宓》，第10冊，頁479；《宓續》，第2冊，頁532；第3冊，頁27、36、155）；1957年反右時，黃成為了右派（《宓續》，第3冊，頁301）。

文系副教授曹慕樊（1911-1993，號遲庵）等先生甚相得<sup>65</sup>。

先生兼任重慶四川省立教育學院史地系主任。

八月十七日，在重慶北碚北溫泉附近縉雲山附近民居中閉關習靜的梁漱溟先生致函先生、侯子溫等勉仁文學院的同事，蓋為學院事也。

九月，先生在二日重慶大火後，考慮到唐君毅先生之母寓居重慶，恐有困難，便將僅有的一枚金戒指賣掉後購置物品，與長女李知勉一道，送至唐家。梁漱溟先生《日記》記當日重慶大火情況：二日，「夜十時後已睡矣，忽子英電告重慶大火，災情極重，求禳災，蓋當正午時燥熱，隨即起風，火以風助而大也」；三日，「子英又電告火災慘狀，將率屬赴渝救濟」。

吳宓先生約先生、傅平驤先生等，籌備在江津吳芳吉（碧柳）先生舊遊之地創建「白屋書院」。但是，十一月三十日重慶解放，因而「白屋書院」未得成立。

臨近解放時，先生開始讀馬克思主義理論書籍，如《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法蘭西內戰》等，常至深夜，興趣盎然。曾說：「以前想過許多問題，有許多看法，不料讀馬、恩著作，疑團頓解。」（〈先生傳〉，頁 718）

十一月，梁漱溟先生的《中國文化要義》由成都路明書店出版。在十月所寫的自序中，他說這本書主要是闡述他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的見解，該著梳理了中國政治文化的脈絡，就中國民主何以難產等重大問題提出了獨特的解釋，強調了民族文化和社會結構的特殊性。

本年。由先生向四川省立教育學院圖書館主任王朝隆先生之薦，先生之弟源委開始在該館工作。

截至本年底，學院師資還有鄧子琴等先生，而曾在學院設壇講學的學者則主要有著名學者熊十力先生、佛學大師呂澄先生（1896-1989），《楚辭》專家湯炳正先生等。梁漱溟的名著《中國文化要義》就是在此時完成。

## 1950 年（庚寅） 42 歲

四月，私立的相輝學院、勉仁學院在被相繼撤銷、合併之後，先生推薦吳宓先

<sup>65</sup> 曹慕樊先生，四川瀘州人，1946-1947 年在四川樂山五通橋中國哲學研究所師從熊十力先生，治佛學及宋明理學，1947 年受聘為北碚勉仁文學院中文系副教授。參見曹慕樊：〈吳宓先生的晚年〉，《書城》，2006 年第 3 期，頁 27。



生到新成立的四川省立教育學院任教。傅平驤先生回到綿竹縣，任縣女子初級中學校長、川西區第三屆各界人民代表會副主席，一九五四年在四川師範學院任教，一九五八年在南充師範學院（後改名四川師範學院，今為西華師範大學）中文系工作，歷任中文系副主任、主任、古典文學研究室主任直到去世<sup>66</sup>。

四川省立教育學院設於重慶磁器口，吳宓先生此次就聘，係得先生之薦，應著名的苦行教育家柴有恆之邀。《吳宓日記續編》(1949-1953)記載：「一九五〇年四月，宓以李源澄介薦，得四川省立教育學院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周西卜、副主任委員賴以莊之聘，來為專任教授（外文系系主任周考成兼）。……至於北碚之相輝、勉仁兩校，則改為兼任各領四分之一薪。」（《宓續》，第1冊，頁16-17）

八月，川教院、女子師範學院（位於九龍坡）合併成為西南師範學院（後改名西南師範大學，今西南大學）。校舍暫定在磁器口，同時在沙坪壩與磁器口之間沙磁樂園一帶建立新校舍（現為重慶大學建築學院）。

先生就任西南師範學院史地系教授兼系主任之職，同時被任命為副教務長，直到一九五七年；外語系教授方敬先生(1914-1996)被任命為教務長。老友吳宓、鄧子琴等先生亦成為西南師範學院教授。吳宓先生當月記載：「川教院已奉令（與重慶國立女子師範學院）合併為西南師範學院，宓遂改為西南師範學院外文系專任教授，由北碚遷來磁器口本院居住，先與圖書館職員李端深（李源澄之弟）同居一室。」（《宓續》，第1冊，頁17）案：先生長弟源委先生隨同院系調整，轉入西南師範學院圖書館工作是在十月，並一直工作到一九七七年退休。

據一九四八年秋考入該院的學生石瓊生回憶：

我於一九四八年秋考入四川省立教育學院（以下簡稱川教院），就讀於史地系，系主任為明史專家張聖莊教授。不久來了一位胖胖的秦漢史專家李源澄教授。李先生上第一堂課時所說的「上我的課，全班如有一兩個聽懂就不錯了」，給我們留下特別深刻的印象。李先生身邊僅有一個讀小學的長女，請了一位中年婦女楊嫂經管他的家務和伙食。此後不久，來了一位清瘦的老學者吳宓教授。吳先生隻身一人，長期在源澄先生家搭伙，一日三餐，未嘗或缺。源澄先生係忠厚長者，為人質樸，待人敦厚，從不擺師長的架子，後來

<sup>66</sup> 鄭青、劉平齋主編：《四川省社會科學手冊》（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9年），頁703-704；《綿竹縣志》（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92年），頁137。

作了我的系主任，師生來往日多，情誼日濃。那時學生伙食不好，登門求教，聆聽教誨後，先生多留下吃飯。此後凡有佳餚，源澄先生總是招呼：「石瓊生，今天楊嫂燉了雞，來喝喝湯吧！」或「今天青菜燉臘肉，來吃青菜頭。」我不便推辭，在李先生家吃飯便成了常事。吳宓先生是飲譽世界的著名學者，早有所聞，並由衷崇敬。但真正認識卻是在李先生家的餐桌上。吳先生很守時，每次總是菜、飯剛剛擺好即來就餐，從不遲到，也不提前。保姆楊嫂從不上桌，女兒李知勉夾點菜，端著飯碗到處跑，也不上桌。平時就是二位先生端坐桌前，相對而食。我在時，則是一個學生陪兩位先生，各據一方，鼎坐而食。<sup>67</sup>

先生家請了一位經管他的家務和伙食的中年婦女楊嫂，在吳宓先生日記中記為「澄家舊僕楊嫂」（《宓續》，第7冊，頁88、126）。

石瓊生回憶：「李源澄先生隨校遷北碚後，政治熱情高，工作積極，講話言簡意賅，領受學生歡迎，和當年上第一堂課對我們講話時的情景完全兩樣，且早就參加了民盟。」<sup>68</sup>

九月，國內發動批判胡適思想的運動。

### 1951年（辛卯） 43歲

一月一日，新年元旦，先生長女李知勉前往吳宓先生宿舍拜年，吳宓先生贈以舊幣一萬元。中午，吳宓先生按照每月十萬元的標準，在先生之宅搭伙進餐；甚至於宴請客人亦在先生之宅，一直到二月結束（《宓續》，第1冊，頁21、33、37、78）。

三日，吳宓先生收到老友李思純來函，托先生及吳宓為次子李祖楨（1916-1997）謀職事。二位先生之努力，一度有希望聘李祖楨為史地系助教，後於十月初成為市一中教師（《宓續》，第1冊，頁25、205、208、220）。

十八日，吳宓先生陪同先生，「穿磁器口市街至陪都醫院，今改為醫科大學，訪趙師楷教授，歸途遇於市中。趙君請飲茶、食柑而歸」（《宓續》，第1冊，頁

<sup>67</sup> 石瓊生：〈跋磁器口紀事〉，見張紫葛：《心香淚酒祭吳宓》（廣州：廣州出版社，1997年），頁444-445。

<sup>68</sup> 同前註，頁448。

38)。

二十一日，吳宓先生率吳芳吉次子漢驥來見先生，並午餐。當晚，先生在宅設宴，親自下廚，為參軍入伍的三名史地系學生餞行：「自為主庖，餞送史地系參軍學生。」（《宓續》，第1冊，頁41）

二月一日，先生與吳宓先生商議，先生勸諫吳宓先生勿應華西協和大學文學院院長羅忠恕先生(1903-1985)之聘，因「華大在改革中，不宜往」，又談自己「辦事之原理方法」，深獲吳宓先生的欽佩，吳宓先生在日記中承認，上年九、十月日記中「評論澄殊嫌太過，未免激於感情矣」。可惜，這一段日記被毀，今難知其原由矣（《宓續》，第1冊，頁51）。

三日，先生陪同吳宓先生、中文系教授鍾稚珣先生(1886-1963)等，赴吳則虞先生(1913-1977)請宴（《宓續》，第1冊，頁53）。

四日，吳宓先生陪同友人拜訪先生（《宓續》，第1冊，頁54）。

六日，農曆新年，先生長女李知勉前往吳宓先生宿舍拜年，吳宓先生贈以壓歲錢舊幣一萬元（《宓續》，第1冊，頁55）。

九日，吳宓先生在先生宅晚餐後，陪同來訪的史地系兼職教授張聖奘(1902-1992)回到自己的宿舍（《宓續》，第1冊，頁59）。

十七日，先生陪同吳宓先生等，赴教育研究室教授高亨先生(1900-1986)請宴（《宓續》，第1冊，頁66）。

十八日，先生陪同吳宓、高亨等先生，赴史地系教授周傳儒先生(1900-1987)請宴（《宓續》，第1冊，頁67）。

二十八日，吳宓專訪先生，商議是否就華西大學之聘，先生說：「本校決不許宓離去，故宓無論如何不能到華西。又告敬方議承乏改主國文系而薦宓主外文系。」極力挽留吳宓先生；先生又建議吳宓可遵就此職，並與教務長方敬剴切詳談，獲得吳宓先生的贊同（《宓續》，第1冊，頁77）。

三月，吳宓先生雖未繼續在先生之宅搭伙進餐，但先生仍時常請吳宓先生來，共同進餐（《宓續》，第1冊，頁99）。

二日、五日，吳宓又二訪先生，商議是否就華西大學之聘，先生說：本校「決不許宓離去，何在華西之請」？先生又言：「明日在文教部當陳說此意。」極力挽留吳宓先生。所謂文教部，指西南軍政委員會下屬機構，是當時中國西南地區文化與教育的最高主管部門（《宓續》，第1冊，頁79、81）。

十四日，先生往訪吳宓，吳宓請晚飯；飯後先生請吳宓到茶館飲茶，之後，二人一起訪許逢熙夫婦於其寓宅（《宓續》，第1冊，頁88）。

四月十五日，鑑於國內政治形勢有所變化，先生胞弟源委先生遇見吳宓先生，第二次勸吳宓先生燒日記、詩稿，並代表了先生之意，吳宓先生雖感其意，而不遵從，表示仍須續寫。吳宓先生記載道：當晚，往訪先生，才回到宿舍，源委先生來，「再勸宓焚毀宓日記、詩稿，或簡擇抄存，以免禍云云。澄意亦同。宓雖感其意，而不能遵從。此日記既難割愛焚毀，且仍須續寫」（《宓續》，第1冊，頁111）。

五月九日下午，先生主持本校四年級師生土地改革座談會，張一夫演講，吳宓先生參加（《宓續》，第1冊，頁133）。

十日，先生就調往華西大學任教等事，徵求吳宓先生意見，吳宓先生不同意，但卻佩服先生知人之明，處事之宜。吳宓先生記載道：「晚7-9 澄攜知勉邀宓至磁器口江邊坡下某茶樓茗敘。澄談校事並評論諸人，皆當。宓甚佩澄知人之明，處事之宜。澄告將調往華西（陳孟汀掌校），但宓以留此為宜。至宓宜與敬接近，有事與敬商量即可。除梓忠誠外，餘人宓皆不足倚恃，云云。」（《宓續》，第1冊，頁133）。

十五日，先生到吳宓先生宿舍，問候生病的吳宓先生（《宓續》，第1冊，頁135）。

二十一日下午，先生參加西南師範學院校務委員會成立大會，與方敬先生均任副教務長。教務長由校務委員會副主任謝立惠先生兼任，吳宓先生等任校務委員。晚上，先生出席西南師範學院校務委員會首次院務會議（《宓續》，第1冊，頁139）。

二十二日，吳宓先生來訪先生，蓋為今日往訪民盟的創始人之一、老友梁漱溟先生之事（《宓續》，第1冊，頁139）。時梁漱溟先生來重慶，下榻於勝利大廈（西南軍政委員會第一招待所），曾與先生一晤，並商談請唐君毅先生回國之事。蓋梁漱溟、歐陽竟無二先生為唐君毅最佩服的二賢。

六月三日上午，梁漱溟先生來到西師，造訪先生於宅，吳宓等先生亦在（《宓續》，第1冊，頁146）。

之後，國學大師王伯沆先生（1871-1944，名澐，號冬飲，無想居士）門人、貴州大學教授錢瑛新（字子厚）先生致函梁漱溟先生，亦有勸請唐君毅回國之事。

梁漱溟將錢堃新來信轉致先生。案：錢堃新先生係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一九一九級的文史地部學生，與同班同學大多成為文史、史地或文哲兼通的名家，尤其是以歷史地理學的學者為特色，如張其昀（曉峰）、王庸（以中）、胡煥庸、繆鳳林（贊虞）、景昌極（幼南）、方培智（圓圃）等。三〇年代初，任中央大學副教授，一九三八至一九四六年任國立師範學院的國文教授。

六日，吳宓先生採納先生的建議，「作領薪詳表，附證件，函上重大乞補薪」（《宓續》，第1冊，頁149）。事遂。

八日，吳宓先生來，一起過今天的端午佳節。先生勸吳宓，勿外調他校，因為方敬先生「生性好強，亟欲使其所主辦之校系超出人上，故宓絕不可表示琵琶別抱之意」（《宓續》，第1冊，頁151）。

二十二日，先生進城，入書店購書，遇見吳宓先生，同乘車歸校（《宓續》，第1冊，頁160）。

二十四日，農曆五月二十日，先生四十三歲生日，先生邀請吳宓、周傳儒先生、學生鄭汝康等在宅晚餐（《宓續》，第1冊，頁162）。

七月十一日，先生作為模範人民教師，出席「尊師遊藝會」。吳宓在日記記載：該會「旨在顯示人民教師之尊貴，而勸本校諸生安心用功，勿圖轉學而去。先請宓與敬、澄、肅等八人坐臺上，插紅花為模範人民教師」（《宓續》，第1冊，頁170）。

十四日，作為西師選拔「參觀土改之教授」之一，先生與吳毓江等先生於清晨出發（《宓續》，第1冊，頁172）。

八月五日，吳宓先生在先生的住宅，與來訪的四川大學歷史系教授徐中舒先生（1898-1991，初名道威，時在重慶西南博物館）會晤。徐中舒先生係一九二五年考入清華國學研究院，時吳宓先生為主任（《宓續》，第1冊，頁184）。

十一日，先生出席西師第七次院務會議，提出聘唐述堯先生（1920-）為史地系副教授，吳宓先生發言贊成，於是通過（《宓續》，第1冊，頁187）。

十三日，先生受友人高亨之托，作函，為高亨外甥無轉學證明而報考附中而詢托（《宓續》，第1冊，頁189）。

十九日，先生在陳新尼先生（1888-?）宅，與吳宓先生等聊（《宓續》，第1冊，頁194）。

九月八日，吳宓先生帶教育學院外文系一年級學生何壽祿，來見先生，請求復

學，先生同意該生參加編級考試；後來，先生在院務會議上，努力使申請通過（《宓續》，第1冊，頁207、210）。

二十一日，吳宓先生如例，即付款購買嵐碳一百斤贈給先生，每月一次，吳宓先生本年來堅持這一慣例至今（《宓續》，第1冊，頁214）。

二十六日，先生撰寫的〈學習《實踐論》後對歷史學的體會〉一文，在《成都工商導報》發表，這是解放後先生發表的第一篇文章。

二十八日，吳宓先生陪同先生，訪柴有恆、王之尚二先生（《宓續》，第1冊，頁219）。

十月三日，吳宓先生專訪先生，推薦老友李思純為西師所聘教員，先生陳述了西師教員的標準：「不重高深學術，而須活潑熱心，竭力為系務及教學，竭力和眾云云。」請吳先轉告李；先生「有力主多參觀，多活動，多知多見人民政府設施之盛功美績，則自然悅服，一己之心情不期而然改變，庶可渾融一片，從其令，效其言，同其旨，乃若皆自我心中茁長而出，不感外鑠被迫之苦矣云云」（《宓續》，第1冊，頁222）。

七日，李思純、李祖楨父子來訪先生，旋吳宓先生來，並邀請眾人午宴。吳宓先生之宴，乃為李思純先生來西師就職事也（《宓續》，第1冊，頁224）。

十二月七日，吳宓先生擔心自己所作的詩貽禍，晨訪先生，先生安慰之。吳宓先生記載道：「晨訪澄，承留早餐，雞蛋麵。宓述詩案，澄謂必無禍，可無憂。案發，只須坦白直陳，絲毫毋隱。但宓根本當力主改造，感情上與共產黨及人民政府完全一致，然後方可融洽，而心情愉快云云。」（《宓續》，第1冊，頁252）

九日，李思純、李祖楨父子宴請先生、吳宓先生，吳宓先生宴間動怒，先生勸慰之。吳宓先生記載道：「宓憂鬱動情，以蒸餃未得食，竟怒且苦。席散復至一德茶社久茗坐。澄勸宓勿憂勿懼，遇事真誠無隱，和平答對，必無禍患云云。」（《宓續》，第1冊，頁255）

十二日，在第十四次院務會議上，先生提出辭去史地系主任之兼職，獲得通過；該職由孫培良先生接任（《宓續》，第1冊，頁257）。

十八日，先生、吳宓先生在下午參加西南文教擴大會議精神傳達會後，又在晚上參加分組討論會，先生、吳宓先生同在第四組，吳宓先生按照先生的指點，表態願意真心誠意地參加思想改造運動，先生即公開予以讚揚。吳宓先生記載道：「宓即自陳熱烈歡迎此次思想改造運動，當誠心積極參加。……庶以後作人民教師定能



純全無疵，而宓更可勇敢地任教，愉快地生活，云云。澄讚宓出言真誠云云。」（《宓續》，第1冊，頁262）

二十八日，吳宓先生微恙，先生專門前往探視（《宓續》，第1冊，頁268）。

冬季某日，先生致函梁漱溟先生，專談唐君毅先生回國事，擬以老友身分告以大陸進步的諸種情形，並打算以侍母盡孝等真情相勸。

十二月三十一日，梁漱溟先生再度揮函勸請唐君毅先生回歸。在致唐君毅的信中，梁漱溟將先生來函轉致。梁漱溟先生信中說：

今夏到重慶，晤李源澄兄，對兄一致懷念，因而相商如何勸駕北來。當時決定由源澄寄書左右，徵求同意；得覆同意，再由我徵問政府意見。適有錢塋新君自貴州來信，專以勸兄北歸之事囑託於我。因即以錢信寄源澄閱，並促問其久無消息之故。茲得源澄覆書，附奉一閱，並作此緘，奉訊尊意。盼見覆。此外則有巨贊法師亦甚關懷足下，曾以此事為問，茲並舉以奉告，悻足下知此間朋友之意略同也。張嘉儀玉川近通訊否，彼是否尚在日本耶。<sup>69</sup>

#### 1952年（壬辰） 44歲

一月二十七日，農曆新年，先生長女李知勉前往吳宓先生宿舍拜年，吳宓先生贈以壓歲錢舊幣一萬元（《宓續》，第1冊，頁287）。

三月四日，先生在第二十次院務會議上，慷慨陳言，被吳宓先生評為：在此全國大變之際，先生卻「竭忠陳策，務遠圖功，徒遭厭棄與摧毀爾。澄在會中似即了悟及此……宓私評澄為『治理亦進，亂亦進者，伊尹也』」（《宓續》，第1冊，頁302）。

六日，輔仁大學校長陳垣先生在《光明日報》發表了〈自我檢討〉的長文，在學界引起震動。隨後，馮友蘭等先生也在《光明日報》發文，進行「表態」、「檢討」。大規模的思想改造運動，在全國文化界、教育界、思想界迅速興起。西南師範學院的教師思想改造運動在五月開始逐漸推開。

二十七日，先生邀請即將奔赴哈爾濱專修俄文的西師七位教師在家便宴，源委、吳宓先生作陪（《宓續》，第1冊，頁316）。

<sup>69</sup> 梁漱溟著，梁培寬編：《梁漱溟書信集》（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6年），頁79-80。

春，唐君毅先生致先生、梁漱溟、錢塋新先生的三封覆信，先後兩日寄出。唐君毅先生表示，很思念舊友，但是暫時不能回歸祖國。

唐君毅在致先生函中說：

關於國內進步情形，我亦略知一二，唯私意皆視作中國民族固有之勤勞樸實任俠之精神之墮於下者之復蘇。……國內共黨朋友來信，意亦甚厚，旨爭取之意。然人本非物，何可爭取。國內學者皆須自認錯，我未錯，從何能自認錯。真理不以人數多少定是非，亦非可以勢力屈人者也。……我此間所接，皆中國之同胞。一生在世，報國之道非一端。我始終未嘗有政治關係，唯以教書著文為事，亦無負於國家也。……

如家母不能再來，我亦終將回國侍母。唯亦當俟我學得如斯賓諾薩之生活技能以後。如欲我稱讚馬列賢於孔子以求食，則決無此可能。此間辦學如武訓之乞食，以武訓之賢，猶不免視為封建奴才，其他更何論哉！<sup>70</sup>

唐君毅在致梁漱溟先生函中說：

賜示及源澄兄示敬悉。錢子厚先生亦毅忘年之至交。承先生等關愛，感激之意，匪可言喻。毅年來亦持以平生師友為念，未嘗以形跡間阻也。……此間所教亦中國之青年。人生在世，求所以自盡及報國之道亦多端，故此間但可一日居，即擬暫不返國。……因先生與子厚、源澄兄皆毅平生最敬佩之師友，故不敢相隱。略抒所懷，不盡依依。<sup>71</sup>

四月四日，先生在第二十二次院務會議上，與吳宓先生發言有所不同。吳宓先生記載道，「宓遂發言，以院務委員職在審議，異於行政當局，故不能負一切責任。而目前問題必須即日決定實行，何可事事推翻前案，從頭複查乎？云云。澄自辯，痛駁宓，且譏斥宓為『老先生』云云。宓頗悔多言，致觸犯澄。然澄勇於自任，進退每失時機，未必自知也」（《宓續》，第1冊，頁323）。

六日，吳宓先生來訪，談院務會議及學校之事，先生堅持自己的主張，吳宓先生感到自己主張的不妥。吳宓先生記載道，先生「仍主任重負責，報國立功。宓自知非矣」（《宓續》，第1冊，頁323）！

二十四日，吳宓先生分別給親友等匯款，因「近日經濟甚苦拮据」，幸得先生

<sup>70</sup> 唐端正編撰：〈書簡〉，《新亞生活》第32卷第5期（2005年1月），頁12-14。

<sup>71</sup> 同前註。

借給的五萬元，「始克分配應付」（《宓續》，第1冊，頁334）。

五月一日，吳宓先生為西師〈學生思想改造宣言〉題字：「學生思想改造之舉，且為教師之先驅及模範，可喜可佩。」（《宓續》，第1冊，頁339）

五日，在西師慶祝五四青年節大會上，主辦者宣布「即將始行思想改造，學生願督促教師改造云云」（《宓續》，第1冊，頁341-342）。

二十三日，吳宓先生午餐後來訪，談思想改造事，先生勉勵多讀新書。吳宓先生記載道，「報告宓學習情形。澄力勸宓多讀新書，以求完全瞭解並欣然接受新觀點，佩服共產黨之公而忘私，為全體人民而犧牲自己之高尚作風。宓心悅誠服之後，庶不以勉強屈服及隨緣應付之心情及態度，從事學習改造矣云云」（《宓續》，第1冊，頁354-355）。在此前後，學校相關人員更多次與吳宓先生交談，囑咐吳宓先生在寫作總結時，「少述事實，多評思想」云云。

二十七日，吳宓先生午餐後來訪，談院務財經、院內人事調動事（《宓續》，第1冊，頁357）。

二十八日，端午節，吳宓先生晨贈先生長女李知勉以舊幣五千元；晚赴先生邀請的家宴，同時應邀出席的還有吳毓江、黃發仁等先生（《宓續》，第1冊，頁358）。

六月二日，吳宓先生晚餐後來訪，談諸事久，並及吳宓先生與重慶大學法律系女生鄒蘭芳(1921-1956)結婚事，先生認為「婚，恐年齡相差太遠，云云」。但半月後，先生同意這一婚事，被吳宓先生釋讀為先生「切勸宓婚蘭」，先生兄弟「逼勸宓即婚蘭」（《宓續》，第1冊，頁361、369、370）。

二十三日，吳宓先生讀「報載北京各校教師陳垣、潘光旦、周培源、吳達元等之自我檢討文」（《宓續》，第1冊，頁372）。即陳垣先生〈自我檢討〉等文。

二十四日，下午三時到六時半，先生與謝立惠先生（主持校政之副主委）、方敬（與先生同為副教務長）的「自我檢討會」召開；晚八時到十一時整，「眾對謝、李、方三公批判」（《宓續》，第1冊，頁373）。

七月八日，在重慶的中共西南局機關報《新華日報》發表了吳宓先生的思想改造的總結長文——〈改造思想，堅定立場，勉為人民教師〉，吳宓先生文章的篇幅不短，提到了先生對自己的幫助，後該文由《光明日報》轉載。吳宓先生在文中曲折地表達了自己一直堅守的文化觀，認為「中國即使亡於日本或任何國家，都不足憂，二百年後中華民族一定可以恢復獨立驅除異族的統治，但若中國文化滅亡或

損失了，那真是萬劫不復，不管這滅亡或損失是外國人或中國人所造成的」。又說：

到了一九五一年經過參加各種運動學習，尤其是批判《武訓傳》的學習，又得李源澄先生之一貫督促，由與中國舊學之比較而推動新思想，並力勸多讀新書，方敬先生之隨機啓發，如指明維吉爾死在耶穌基督誕生之前，又希臘某某兩神話可解釋為勞動創造世界及人民智慧等，我的思想方才漸漸地轉變，提高了不少。我發現我的情形是如此：在事實與行動方面，我能很容易而且很快明白地認識，誠心地服從，並負責地實行。

二十日，吳宓先生偕西南博物館秘書文德陽先生(1905-)來訪先生，並邀請先生、陳新尼先生等午宴（《宓續》，第1冊，頁383）。

八月十九日，吳宓先生來訪，與先生商談自己的婚事，先生提出自己對老友參考意見。吳宓先生記載道，宓「述對蘭情事，及宓今者宜於三途擇一，即（一）婚蘭，（二）獨身，（三）依佛懺悔以出世之心，並絕蘭雪，一切不問。澄謂……宓拒斥婚蘭，不肯就範已難。繼謂以宓性特異，依佛出世，恐難潛心，不一覽無餘堅持云云」（《宓續》，第1冊，頁399-400）。

二十三日，吳宓先生晚飯後來訪，與先生談院分配草案事，先生請吳先生讀自己的「思想批判總結」（《宓續》，第1冊，頁402）。

九月二日，吳宓先生陪同四川省政協常委黃稚荃先生（1908-1993，女學者、詩人、書畫家，此前曾任成都第一女子師範、四川大學文學院教授等職）來訪先生，未遇（《宓續》，第1冊，頁414）。

十一日，故友、四川省政府參事王恩洋先生來訪（《宓續》，第1冊，頁410）。

本月底，因高校調整院系，西南師範學院擴大建制，並從沙坪壩區遷到北郊縉雲山麓的北碚。

此時西師中國民主同盟小組已有四十多位盟員，先生為負責人。先生關心民盟事務，處理並保存了多種民盟檔，去世前託付給老友吳宓先生（《宓續》，第5冊，頁142）。

十月七日，西師全校師生員工大會在大禮堂召開，先生陪同並介紹文教部派駐西師工作組組長兼西師調整委員會主委姚大非同志與眾見面並演講（《宓續》，第1冊，頁434）。

十二日，北碚部分盟員參加重慶市第一次盟員大會，選舉產生民盟重慶市支部第三屆委員會，西師外語系教授方敬先生為委員，中文系副教授耿振華先生(1913-1985)為候補委員。

十一月，在中共西南局領導下，給高校教師評級，充分發動群眾，以「德、才、資」為標準進行評定。

十二月六日，中央教育部的任命令在西師公布，先生為副教務長，方敬先生為教務長。同時，院務委員會即行取消。根據吳宓先生的記載，先生在此之前，已經以民盟盟員的身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宓續》，第1冊，頁472）。

本月初，重慶醫藥衛生學校以吳宓先生通拉丁文，擬聘任到該校兼職講授。為此，先生與吳宓先生這對老友之間，一度產生了一點小誤會。

九日，先生與吳宓先生途遇，先生告訴吳宓，自己與教務長方敬先生未能同意吳宓先生為重慶醫藥衛生學校聘任的原因，在於「恐校中其他教授援例，而兼課本非專任之所應為，故不許」，先生又說方敬先生「重感情，篤於朋友，其愛護宓始終無異」，「非薄於宓也」（《宓續》，第1冊，頁471、474）。雖然吳宓先生有所怨言，但仍認為先生「甚能保全善類、汲引文士學者」，是「宓在此托命之知友」（《宓續》，第1冊，頁471、474）。

二十八日，端委、吳宓先生一起散步，轉告先生希望吳宓先生與鄒蘭芳女士結婚之意，這是當時吳宓先生的多位友人的共同看法。吳宓先生記載道：「委謂宓之友如澄等皆望宓婚蘭。」（《宓續》，第1冊，頁484）

三十一日，文教部核定通過了西師教員評薪方案，先生與吳宓先生均為七級，每月工資上調四十萬元（《宓續》，第1冊，頁485）。

### 1953年（癸巳） 45歲

一月初，梁漱溟先生到重慶北碚，舊地重遊，與先生、吳宓、鄧子琴等許多老友和原勉仁學院的學生多人見面，晤談甚歡。

三月一日，民盟北碚分部委員會成立。這是全國第二個建立的市民盟轄區級地方組織。先生當選為委員。民盟北碚分部主委王道容（西農），副主委方敬（西師），委員有耿振華（兼宣傳部長）、葉謙吉（兼秘書處主任）等。成立大會上有三十名新盟員宣誓入盟。時西師已有盟員五十四人。

三日，吳宓先生將致院長辦公室的結婚請求公函送到教務處，面交先生，先生

閱後，深為老友高興，說：「早應如此決定。」（《宓續》，第1冊，頁499）

九月底，先生作為西師代表之一，前往北京出席全國高等師範教育會議。該會議於九月二十八日至十月十三日由教育部在北京召開。會議總結了師範教育工作的經驗，討論了當時師範教育的一些基本問題，確定了高等師範學校在今後五年內的發展方針，即「在整頓鞏固現有高等師範教育的基礎上，根據需要與可能，有計劃有準備地予以大力發展」。會議還根據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國家第一個五年計畫的基本任務，修訂了一些專業的教學計畫，規定了實施和培養師資的辦法<sup>72</sup>。

十一月一日，先生約請吳宓先生來宅家宴，同時應邀而來的還有曹慕樊等先生，先生家人除了夫人、內弟、次女知方外，還有長弟源委先生等。先生講述此次北京全國高等師範教育會議之行之「所見所歷，深讚政府教育政策之穩定與明達，及主事者之精幹爽直云云」（《宓續》，第1冊，頁548）。

二十八日，先生在全校作〈全國高等師範教育會議傳達報告〉第二部分教學改革（《宓續》，第1冊，頁550）。

十二月，隨著民盟組織在北碚陸續發展，分部在西師區、西農區、西南俄專等分別成立，中國民主同盟師範學院小組改組為中國民主同盟師範學院總支，第一屆主任委員（簡稱主委）為耿振華先生，先生為副主任委員（簡稱副主委），委員有黎滌玄、漆宗棠、王正華、郭豫才、劉又辛等先生。

本年，先生仍兼任副教務長。

## 1954年（甲午） 46歲

一月，先生借款二萬元於吳宓先生，助其周轉需要（《宓續》，第2冊，頁6）。

二月十四日，吳宓先生歸還先生借款（《宓續》，第2冊，頁7）。由於各種政治活動日益增多，兼之，吳宓先生結婚，二位先生的來往，開始較之以前有所減少。

六月二十日，農曆五月二十日，是日為先生四十六歲生日，先生邀請吳宓先生來家午宴，並告訴吳宓先生，可以代為李思純等先生介紹工作。談甚久，方敬先生

<sup>72</sup> 張晉藩等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大辭典》（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頁145-146。



來，大家談羅念生先生所翻譯的英國小說家亨利·斐爾丁(Henry Fielding, 1707-1754)所著的小說(《宓續》，第2冊，頁41)。

二十七日，吳宓先生來訪先生，時談壯飛先生在。先生稱讚新中國威勢之日增，並針對吳宓先生所說的歷史系中情形，建議吳宓先生遇事多與系中諸人細商。吳宓先生告辭，先生「堅送至樓下宅門外，行禮而別」(《宓續》，第2冊，頁47)。

七月六日，先生委託教務處鄭祖慰同志到歷史系，與吳宓先生商議入學考試閱卷事(《宓續》，第2冊，頁52)。

十月，西南行政區撤銷，重慶由中央直轄市改為四川省轄市。

十二月，中國民主同盟師範學院總支換屆，第二屆主任委員仍為耿振華先生，先生仍為副主委，委員有漆宗棠、王正華、郭豫才、劉又辛等先生，秘書為曾昭穎。

本年，先生與歷史系教師有一合影(右第二人，見《宓續》，第2冊，卷首照片一)。

在中蘇友好、對蘇一邊倒的大背景下，西師學習蘇聯先進經驗，各系設教學小組若干，教學小組定期召開例會、教學經驗交流會，探討學習馬列主義及教學問題，討論教材，互相聽課，力求在教學中運用馬列主義觀點。

### 1955年(乙未) 47歲

一月中旬，先生與方敬赴成都，參加全省會議。

二十六日，正月初三，吳宓先生在劉尊一先生的陪同下，前往先生宅拜年，知先生在成都開會，尚未歸來，因此，未得與「所欲訪謁者」，即先生晤面(《宓續》，第2冊，頁111)。

二十九日，吳宓先生與營山縣中學俄文教師姜華國夜訪先生，長談三小時，先生款待以白酒，談「共黨以忠誠詳密，百事皆成功，其勢方蒸蒸日上云云」，吳宓先生又付給知勉、知方「年賜」，即壓歲錢一萬元(《宓續》，第2冊，頁114)。

二月八日，報載重慶市政協委員名單，先生名列其中(《宓續》，第2冊，頁119)。

十九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重慶市第一屆委員會正式組成，蕭華清為副主

席，先生、鄧少琴先生等當選為委員。

二十日，先生在市政協大禮堂出席會議，市長任白戈主持，吳宓、黃稚荃等先生均列席。

二十一日，西師歷史系系務委員會召開成立大會，先生及院長謝立惠代表校方出席，並做演講指示。委員會主任孫培良先生，吳宓先生等六人為委員（《宓續》，第2冊，頁127）。

春季，先生積極回應政府號召，購買公債五十萬元（折合新幣五十元，一九六一年出售給吳宓先生，見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八日的日記）（《宓續》，第5冊，頁94）。

三月十九日，民盟成立十四周年紀念日，重慶市召開了民盟第三次盟員代表大會，先生與會。

四月二日，先生在家設饌，宴請黃稚荃先生，並邀吳宓等先生作陪，稚荃先生因病未克與會（《宓續》，第2冊，頁127）。

十日，先生在長弟端深之新宅主持端深與熊家璧女士之婚禮，吳宓先生應邀赴茶會，「封送賀儀新幣四元，簽名於紅帛」。案：從三月起，全國實行新的幣制，舊幣一萬元兌換新幣一元（《宓續》，第2冊，頁146）。

夏季，西師開展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大批判，不久發展為「肅清反革命運動」。次年一月結束。

七月一日，吳宓先生來訪，轉送川大繆鉞先生囑託論文，先生詢問授課等事，並有所建議，又說吳宓先生胡適批判文可不作。吳先生聞言，甚喜，之後又認為先生為自己回護（辯護、愛護）良多（《宓續》，第2冊，頁212、228）。

十日，端深先生夫婦在新宅辦婚後酬客家宴暨先生生日宴，吳宓先生應邀到席；餐後，吳宓先生陪同先生往訪教員穆濟波先生（1892-1978，字孟默），未遇（《宓續》，第2冊，頁217）。

八月二十九日，先生與吳宓、中文系教授賴以莊（1891-1966，字肅）先生訪孫培良先生，並茗敘，閒談系事（《宓續》，第2冊，頁253）。

九月三十日，先生訪吳宓先生，轉達張永青院長仍舊堅持吳宓先生「應自作主張，對『世界古代史』課負責，不應徇甫、興之意。若分段各撰講稿，亦不可行」（《宓續》，第2冊，頁281）。

十二月二十日，先生與吳宓先生途遇，同往訪賴以莊先生，勸吳宓先生下學期

若不擬主講「世界古代史」，可直謁各院長談（《宓續》，第2冊，頁335）。

### 1956年（丙申） 48歲

一月二十五日，先生應邀赴方敬先生家宴，此次主要客人為姜華國，先生、吳宓先生、高涯生先生（副教務長兼教育系副主任）等作陪（《宓續》，第2冊，頁361）。

三十一日，先生應邀列席歷史系系務委員會，安排本學期課程等事（《宓續》，第2冊，頁364）。

二月十三日，正月初二，李知勉為吳宓先生拜年（《宓續》，第2冊，頁371）。

十八日，先生邀請吳宓、孫培良等先生在宅晚宴，飲葡萄酒，「飯畢，諸客先散去，良亦辭去，宓獨留與遠、澄閒話至十點始歸」。「遠」即西南俄語專科學校教員譚志遠（《宓續》，第2冊，頁374）。

二十七日，先生應邀出席重慶市知識分子代表大會，下榻於重慶賓館，與吳宓先生同住三一五室。上午，會上傳達了周恩來總理的知識分子報告。下午，分組討論。晚上，先生在室中撰發言稿，直至晨四點方寢（《宓續》，第2冊，頁380、381）。

二十九日上午，先生在會上發言，「所講二端，切實中肯，眾鼓掌歡迎。稿皆鉛印分發，存」。晚上，先生與吳宓先生在室中聊天，說吳先生「年來性情愉快，即是改造之成績」（《宓續》，第2冊，頁384）。

三月一日，重慶市知識分子代表大會閉幕。

四日，吳宓先生在成都出席四川省政協第一屆第二次會議上首先發言，簡述自己思想改造歷程時，採用先生所囑（《宓續》，第2冊，頁389）。

二十四日，先生往訪吳宓先生（《宓續》，第2冊，頁408）。

四月二十六日，西師歷史系教授十一位敬獻花圈於吳宓先生夫人鄒蘭芳女士（昨晨病逝）靈前，含先生在內（《宓續》，第2冊，頁422）。

五月十九日，先生在家設晚宴，請教務處職員黃大秀女士、吳先白先生等，並邀吳宓先生作陪，並詢問吳宓先生對加入民盟的看法。吳宓先生記載道：「宓談蘭病歿情形……。客散，宓復留與澄敘話。宓述熊十力近著之大旨。又述宓捐書事，及宓對文字改革之意見。澄詢宓是否已申請入民盟？宓答否，且不欲加入，云

云。」（《宓續》，第2冊，頁431）

六月，中國民主同盟師範學院總支換屆，第三屆主任委員仍為耿振華先生，先生仍為副主委，委員有黎滌玄、郭豫才、劉又辛等先生。

七月四日，吳宓先生在致上級的公文中，稱先生為朋友（《宓續》，第2冊，頁459）。

九月，全國高校進行工資普調與教師定級。吳宓先生被定為一級教授，月薪272.5元。吳長期自奉甚儉，衣食住用一貫簡樸，而將工資中的大部分長期用於資助親朋（如亡友吳芳吉先生的家屬）及困難學生。

十七日，端深先生轉他人之意，欲為喪偶的吳宓先生介紹女友，為謝免（《宓續》，第2冊，頁514）。

二十九日，先生病，吳宓先生來家探視，聊，先生勸吳宓先生「宜居北京云云」，並親送出（《宓續》，第2冊，頁527）。

本月下旬，先生的章門師弟吳則虞先生歸自京滬，為先生、吳宓先生講述師母湯國黎女士等事（《宓續》，第2冊，頁524）。

十月二十九日，先生應邀，到送鶴樓酒樓，赴吳宓、孫培良先生之宴請，席散，聊，吳宓先生陪先生歸（《宓續》，第2冊，頁546）。

同月，中共八大召開。黨中央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

十一月二十四日，先生在方敬先生宅，與吳宓先生談正在進行的工資改革方案。先生與方敬先生均認為，吳宓先生應享受二級教授之等級。之後，吳宓先生又陪同先生歸家，再聊。吳宓先生記載道：「宓復托敬以宓求列入新三級之意，代陳院長。敬、澄均謂，初亦同宓之想法，其後得悉北京、成都各地之等級方案，認為宓列入新二級絕不能謂之過高，且眾意皆服，無或反對者，故宓似可自處於不聞不問，若將來確在新二級，即安然承受之可也，云云……宓在澄宅，……是晚宓論公私事，頗傷憤激多言，甚不合。」（《宓續》，第2冊，頁563）

十二月二十四日，先生在西師會議廳，主持歡迎民盟中央副主席羅隆基先生（1898-1965，字努生）之民盟座談會。吳宓先生記載道：「賓主共十六人，設茗糖果，為招待羅隆基。羅為民盟中央副主席，新任森林部長，自云身兼六要職。此次以全國人民代表資格，來宣達中央德意，詢問知識分子之疾苦與意見。……眾推宓先，……總之，宓是日談話太多，態度殊狂肆，且多敘及宓友生，有私嫌，大悖慎言免禍之旨，以是甚悔。」（《宓續》，第2冊，頁587）

十二月二十五日，先生遷新居，吳宓先生來訪，先生乃以《原儒》授讀（《宓續》，第2冊，頁588）。

在一九五七年「反右」之前，先生全身心投入教育事業，積極努力。

解放初期，他看到舊社會的一些腐敗現象消失了，人民當家作主了，國家一天天地好起來，他深受鼓舞，精神爲之振奮。於是把整個身心都投入了教育工作，連一生從未間斷過的學術論著也停止了。

作爲副教務長，除了上課之外，對學院課程設置、工作安排，以及教師待遇、家屬照顧、子女教育，無不關心。教師中有什麼困難或思想問題，便及時約他們茶敘，與之傾心交談，直到使之心情舒暢。他每月的工資，除必要的生活費外，多用於這類工作之中。凡朋友從外地去看望他，總要和友人一道慢步於西師校園，並一一指點介紹：「這是教學大樓，這是實驗大樓，這是運動場。……這樣宏偉的建設規模，在解放前是從來沒有的，共產黨辦教育真有氣魄，這才是真正的辦教育！」（〈先生傳〉，頁718）

### 1957年（丁酉） 49歲

一月一日，新年元旦，戴蕃璿先生來拜年，還未告辭，逢吳宓、上任系主任孫培良、現任系主任郭豫才先生來拜年。於是，先生陪同吳宓、孫培良等先生，依次往謝立惠院長、教務長方敬先生、王逐萍院長、人事處長李一丁、歷史系黨支部書記季平處拜年（《宓續》，第3冊，頁3）。

二日，先生即將赴京開會，故特訪吳宓先生，又勸吳宓先生「更開懷暢言，勿憂禁忌」（《宓續》，第3冊，頁4）。

二十四日，先生從西師入城，出席市長任白戈同志所作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學習報告（《宓續》，第3冊，頁16）。

三十一日，正月初一，吳宓先生來拜年，「玩麻雀牌，食冠生園年糕。讀《人民日報》所載毛主席詞若干篇。……取得彭舉（雲生，崇慶）新詩三篇」。可知，先生在本年初仍與老輩彭舉先生有詩歌往還（《宓續》，第3冊，頁21）。

二月十五日，先生專訪吳宓先生，勸請吳先生加入民盟，又約請次日出席民盟座談會（《宓續》，第3冊，頁31）。

十六日，吳宓先生就勸入民盟事，到教務處會先生，未遇。乃前往北碚公寓樓上客廳，赴民盟邀請之座談會，先生、民盟重慶副主任委員李康先生等人均在。午

宴，先生與吳宓先生在一座（《宓續》，第3冊，頁31-32）。

本月，民盟師範學院總支換屆，先生當選為第四屆主任委員，第一至三屆主委耿振華先生當選為副主委，委員有黎滌玄、李麟徵、尚莫宗、葉勝勇、高兆奎等先生。

二十一日，在歷史系系務委員會的「本系師資培養與提高問題」會議上，現任系主任郭豫才提出，先生表示「願培養研究生（秦漢至北宋）三名」，吳宓先生主張歡迎（《宓續》，第3冊，頁35）。

二月或三月，民盟中央常委、中央民族學院副院長、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1910-2005)進行調查研究時，到達重慶，曾與先生會晤，與先生在某咖啡館裏長談了一下午。費先生為先生的學識深深折服，不由友善地讚歎道「李先生有王佐之才」。費孝通先生此次長達數月的西南之行，與先生、先生的師兄劉文典先生等眾多高校教授會面，感覺收穫良多。

三月二十四日，費孝通先生在《人民日報》發表〈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一文，說：

我想談談知識分子，談談我所熟悉的一些在高等學校裏教書的老朋友們的心情。所談的無非是一隅之見，一時之感；寫出來還是雜文之類的東西而已。……去年暑假，我初到昆明，曾會見過不久前為了注杜詩特地到成都草堂去採訪回來的劉文典老先生。……去年下半年，我一直在西南一帶東跑西走，在朋友中聽到了這種感歎是不多了。周總理的報告對於那些心懷寂寞的朋友們所起的鼓舞作用是難於言喻的，甚至有人用了「再度解放」來形容自己的心情。知識分子在新社會裏的地位是肯定了，心跟著落了窠，安了。

四月，毛澤東主席提出，歡迎黨外人士幫助黨整風。中央的政策和號召，解除了大家的顧慮，為國為民獻計出力的積極性普遍被調動起來，知識分子歡呼「春天來了」。

二十六日，院長張永青專訪吳宓先生，「勸令大膽爭鳴，暢言無隱」（《宓續》，第3冊，頁68）。

五月十一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重慶市第二屆委員會組成，蕭華清為副主席，先生當選為委員。

十五日，毛澤東主席寫〈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指出：「最近這個時期，在民主黨派中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現在應當開始注意批判



修正主義」。

本月，在知識分子的春天中，先生請人為自己拍攝一張個人影像，神情從容，不料後竟充為遺照（《宓續》，第3冊，頁541）。

同月，重慶市高校、文化等系統展開「大鳴大放」。

六月三日，《重慶日報》一版頭條報導〈西南師範學院鳴放邁步深入，教師們就黨委制問題各抒己見〉：外語系熊正倫、秦蔭人、歷史系吳宓、孫培良、教育系郝慶培、鄧胥功、地理學王鐘山教授等，「在發言中，一致主張高等學校仍然應當實行黨委領導制，但須克服缺點，擴大民主」。

八日，中共中央發出毛澤東起草的〈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的指示〉，正式發動反擊右派的鬥爭。當日，民盟副主席章伯鈞(1895-1969)成為中國第一號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十一日、二十三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工人說話了〉、〈不平常的春天〉，反右派運動開始。

二十一日，張永青院長在大禮堂作〈本校之鳴放與整風〉的報告，號召「全院同志及同學皆積極參加此對右派分子之政治鬥爭、階級鬥爭」（《宓續》，第3冊，頁114）。

在反右派運動中，西南師範學院教職員和學生先後被錯劃為右派分子的共六十二人，占全校總人數五八五五人的百分之十以上。反右擴大化雖是全國性的，但該校比較突出。吳宓先生「自幸謹慎和平，尚無過分之言論，差可免禍全身也矣」（《宓續》，第3冊，頁108），免於難。

七月一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親筆撰寫的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指出：「民盟在百家爭鳴過程中和整風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別惡劣。」這個指示和社論，標誌著反右派鬥爭在全國範圍內展開和進一步升級。民盟中央主席史良先生(1900-1985)在民盟中央的會上說，民盟在全國已處於「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的地位了。不久，費孝通先生就被點名為「章羅聯盟的軍師」（章伯鈞及民盟第二屆中央副主席羅隆基），成為全國聞名的右派，受到了報紙上連篇累牘的文章批判，從此沉寂了二十年。

同日，西師教育系集會，系主任普施澤「聲言陳東原仇恨共產黨」<sup>73</sup>。陳東原先生係先生介紹加入民盟，此或是先生獲罪之由。

<sup>73</sup> 《重慶日報》1957年7月3日報導，見《宓續》，第3冊，頁123。

二日，《重慶日報》載文，攻擊先生與曹慕樊先生「朋比為奸」云云（《宓續》，第3冊，頁122）。

下午，張永青院長在大禮堂作〈西南師院反擊右派分子之運動〉的動員報告，指出與右派分子之間是尖銳之政治鬥爭，也是「一大階級鬥爭。彼右派有完全組織——民盟中之章羅聯盟，其十條指示，季康、舒軍在西師已有人代為執行成功，故非『小題大做』。亦不可旁觀。社會秩序將大亂」。文中所謂「在西師已有人代為執行成功」，即是指先生等右派分子（《宓續》，第3冊，頁121）。

三日，西師民盟開會，會上蕭華清宣稱，先生等人「之罪甚重，勞動改造猶不足蔽辜」（《宓續》，第3冊，頁123）。

五日，心情沉重的先生，令胞弟源委先生告訴吳宓先生，「戒其勿往見，為避嫌」《吳宓日記》七月二十二日記載（《宓續》，第3冊，頁124）。

在一系列指示和社論的號召、部署下，一場全國規模、疾風暴雨式的反右派鬥爭迅速地發動起來了。作為民盟發源地的四川，在反右派鬥爭中受衝擊最大<sup>74</sup>。

在沉重的政治壓力下，省民盟第一副主委、秘書長趙一明先生寫出長篇系統的交代檢查後，被迫進一步「交代揭發」說：「四川盟內確有一個『無形組織』，這個組織的成員是：潘大逵、胡克林、趙一明、舒軍、季康、馮克熙、韓文畦、張松濤、劉南、李源澄、楊復全、戴星如、張聲明等。這個組織的核心又是潘大逵、胡克林、趙一明、舒軍、李康、馮克熙等六人。」<sup>75</sup>所謂「無形組織」成員名單上的人，不少為先生的老友，如韓文畦先生就是一九三七年與先生在成都創辦《重光月刊》的友人，一九三九年一月西康省成立後，擔任了「省政府委員，教育廳廳長，銳意振興，清廉自守。因韓文畦同志，平素為人正直，作風正派，……經師友張瀾先生的介紹，於一九四六年春正式加入了中國民主同盟的組織，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教育下，積極從事於和平民主運動的工作，尤其是面臨西南解放前夕，在川、康軍政較上層人士中，開展民主統一戰線工作，做出了極大的努力」<sup>76</sup>。此時，也被先後全部劃了右派。

七日，民盟通過學校廣播，批判先生（《宓續》，第3冊，頁125）。之後，

<sup>74</sup> 根據民盟四川省委機關作專職幹部、1957年任宣傳部副部長的趙錫驊先生的回憶。見趙錫驊：〈「章羅聯盟四川分店」真相〉，《炎黃春秋》，2004年第2期，頁18-22。

<sup>75</sup> 見《四川日報》1957年7月29日。

<sup>76</sup> 《內江縣文史資料》第8輯（1984年），頁13。

先生被錯劃為右派。

十、二十日，吳宓先生與系主任郭豫才談與先生之關係等事（《宓續》，第3冊，頁128、134）。到了二十七日，先生之事就成了罪案（《宓續》，第3冊，頁138）。

先生在七月被錯劃為右派而受到處分，被降級降薪，撤銷了行政職務及民盟內的主要職務，只保留下教授頭銜，健康受到了精神上的摧殘和身體上多種疾病（高血壓、肝病、盲腸炎、精神病等）的雙重打擊。

本月中旬，學校安排端深先生伴護先生「至溫泉休養，伴居一星期」，「盲腸炎發，校命送九醫院，醫以其高血壓未敢割治」，於下旬歸家靜養（《宓續》，第5冊，頁184）。

先生被錯劃為右派的原因，可能是因為介紹陳東原先生加入民盟。吳宓先生在六月二十八日記載道：曹慕樊先生「來，共歎近日風氣轉變對中國、對共黨之大損失」，評論曹慕樊先生「以讚美牛津大學、澄以介紹陳東原入民盟，均獲罪矣」（《宓續》，第5冊，頁120）。

先生成為右派後，迫於形勢，曾自撰「檢討書」，未寫完就發病，到次年先生去世，仍未完成（《宓續》，第5冊，頁120）。

七月下旬，源委先生、好友賴以莊先生等遇見吳宓先生，告知先生受到迫害後，精神已經失常，就連胞弟源委先生也不認。吳宓在七月二十二日記載道：

連日晚間，普施澤與豫等坐院中，所談無非右派諸人之罪行。……今夕聞賴公言，昨遇委夫婦見告，澄已得瘋疾，見委亦怒斥之曰：「汝亦來打擊我乎？」嗚呼，經此一擊，全國之士，稍有才氣與節概者，或瘋或死，一網打盡矣。（《宓續》，第3冊，頁135）

二十三日，吳宓先生記道：

嗚呼！鳴放之在西南師院，只為教育系、中文系、外語系、歷史系系主任之藉端報復、消滅異己者而已。至受禍諸人，則或緣名利心重，欲為系主任，或本才學優長，平日苦受壓抑，而其人性行亦有缺點（過剛，而不善自藏），遂遭忌受讒，而罹於禍。以上只舉文科四系，其他教職員多類此。凡宓所記，皆信史之應秘傳者也。（《宓續》，第3冊，頁136）

吳宓先生所謂「本才學優長，平日苦受壓抑，而其人性行亦有缺點（過剛，而不善自藏），遂遭忌受讒，而罹於禍」，蓋指先生之儔乎？

八月十日，針對校園中右派日益湧現，吳宓先生觀察道：「此次定罪之徑路及範圍，要以全國各地章、羅之黨羽、民盟之活動為主；故在西師，以澄為中心首犯，若馨、瑜、辛及史系之滌，彥，中文系之樊、勳等，皆視為澄民盟活動謀逆之從犯。」（《宓續》，第5冊，頁148）

十六日，先生「成為本校最大的罪人」，吳宓先生在日記中如此不明白地記錄道，當日拂曉，吳宓夢見先生「將作檢討。澄工作服，面色灰暗若死，精神頹喪」，吳宓「深覺不祥」（《宓續》，第3冊，頁152）。

三十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四川的右派群丑〉一文，揭露批判了以四十年代的著名民主教授潘大達為首的「章羅聯盟四川分店」所謂「群丑」的言行。

本月，先生的病情加重，「恒在家焚香，見人叩頭，忽又命設筵宴客，實無一客來。中間曾自往北溫泉，……在樓外徘徊笑歌，至夜二時始載澄回家」，「此後，校方命車送西南醫院精神病科診治，已與醫院商妥，而澄堅不肯往，遂止。……平日在校內獨往獨來，或獨坐校門口，自言自語。見人能認識，然易怒」（《宓續》，第3冊，頁184）。

九月一日，《人民日報》用大號黑體字通報：「章羅聯盟四川分店——以潘大達為首的右派陣營，在人民群眾上下夾攻、內外會攻之下，已全線瓦解。」所謂「章羅聯盟四川分店」便如是產生，潘大達也被加上了這個分店頭目的頭銜，並據此被進一步追查批判。按照這一邏輯，先生屬於「章羅聯盟四川分店」在西師的為首分子。

二十三日，吳宓先生敢於在日記中記道：先生「實一誠實之人，並無大罪，僅以其所居職位，為以上諸民盟之人牽率而陷於罪戾，無法自白。黨內領導亦盡知，而弗能為之開脫」（《宓續》，第3冊，頁180）。幾天後，吳宓先生得知先生的胞弟即使「奉校中當局命，伴視其兄，且遭人攻詆」，近一個月未敢前往探視；作為多年深知的老友，吳宓先生也自責：「今於交久誼深之澄，宓乃不敢至其家一探視，亦不能延蔡醫為之診治。」（《宓續》，第3冊，頁184）

十月一日，吳宓先生打算前來探視先生，「復懼禍及，而止」；乃決定先去見校方領導，「求准宓往勸說澄，一以探其病之真情，一以速其悔罪輸誠云云」（《宓續》，第3冊，頁185）。

六日，吳宓先生還與另一右派曹慕樊先生商量來探視先生事，曹認為，吳宓先生去見校方領導時，「必須站穩立場，只說宓此行之目的，為(1)察知澄瘋病之真

偽，(2) 勸誘澄速交代一切，俾學校早日了結澄案云云」；若得准往訪先生，先生見了吳宓先生，「必感慰，且得知外間情形，諸右派分子實況，其心可安，其氣得舒，病必隨之輕減」。此行後未果（《宓續》，第3冊，頁187）。

### 1958年（戊戌） 50歲

一月八日，端深先生訪吳宓先生，說先生髮多白，吳先生打算請醫生前往診治，「以詳詢澄在醫院之病況」（《宓續》，第3冊，頁225）。

二月十五日，吳宓先生在拂曉夢見先生：「將曉，夢澄。面容肥圓而紅潤，修飾整潔，已留鬚，髮光可鑑物，自言『思想已改進，一切今皆明白』云云。宓疑此夢不祥。」（《宓續》，第3冊，頁244）

本月中旬，梁漱溟先生從北京致函先生，「關心澄病」，即詢問先生的病情（《宓續》，第3冊，頁245）。

三月，西師繼續開展批鬥右派。

先生為人剛直正派，反右後曾一度被送往精神病院診治，養病，堅持不去；約在本年春季三、四月間，「學校由歌樂山市立精神病院召澄歸，將作處理。此時，澄已甚清醒，曾函上張院長認罪，並願改造，勉為歷史教師。在家掃地，勞動，讀史書及新教本」（《宓續》，第3冊，頁281）。

四月三十日，吳宓先生聽說先生已經回校，在西師家中，校園傳先生之「罪則甚重云」（《宓續》，第3冊，頁278）。

五月二日，先生病情突然惡化，急請市里中醫來校診治。

三日，先生病症加重，臥床不起，送至「本校衛生科就診，立即輿送（市）九醫院，斷為肝臟僵縮（已小如拳）之症，且謂其發已久。歌樂山病院只治瘋疾，未做全部檢查，是以致誤，今只有十分之一之生望，云云」（《宓續》，第3冊，頁281）。

四日下午，先生在家中，因患肝癌、肝硬化等多種疾病，鬱鬱而終，時年五十歲（《宓續》，第3冊，頁281）。

先生在彌留之際，對老友吳宓先生有所寄託。吳宓先生記載道：「其時全身虛黃，口中流出血甚多，污染衣被。歿時長女知勉侍側。澄命知勉往見吳伯伯（宓）陳述一切。」（《宓續》，第3冊，頁281-282）。後來，系上有人公開以此事實質疑吳宓先生，吳宓坦然說：「宓覺澄能知我，知我至少是一舊式無原則之好人，勉

來謁宓必能助之，他人未必能助也。」（《宓續》，第3冊，頁309）

一說因先生太剛直了，「氣得太狠」導致肝破裂去世。先生之學生石瓊生回憶：到了一九五七年，先生「不料，反右時被打成『右派』，這突如其來的晴天霹靂是天真而古道熱腸的源澄先生萬萬沒有想到，也是萬萬不能接受的，當即神經分裂，送往精神病院後不久，即肝裂辭世。其長女李知勉，中學畢業後在一家電廠當工人，現已年近五十，其夫人係家庭婦女，李先生不幸逝世後生活無著，雇傭無門，窮困潦倒，後來被當作『地主分子』，攜其未成年之幼女，被強制遣返原籍農村，至今生死不明。寬厚愛人、博學精專、不斷探索進步的源澄先生及其家人遭際如此，良可哀歎，令人心戚」<sup>77</sup>！

先生去世後喪事的安排，吳宓先生記載道：先生「歿後，學校始由鄉間（下放農村）召委歸，給治喪費一百元（兩月未給右派薪矣），並派二校工為助。五日上午棺殮（棺值六十餘元）。……隨即葬於陳家山上北碚區公墓（一百元尚剩六十七元，當即繳還學校）」（《宓續》，第3冊，頁281-282）。

五日，吳宓先生方才得知，先生已經於昨天去世，他感慨道：

竊念澄之為學，夙為宓所欽佩。惟有才而不能下人，喜獨樹一幟。故抗戰以來，曷歷各大學（浙大、川大、雲南），參加或自辦書院（民族文化、靈巖、五華、勉仁），犧牲個人之薪金地位，辛苦自營，不可不謂有志之士，特立而獨行者。解放後，得為西師副教務長，並援引勉仁諸同事先後至西師安居授課，亦極能熱心助友者。……宓早嫌其仕進之心太熱，有為之念太重，但亦喜其在校能主張正學，扶植善類。不圖澄仍以報效共產黨、報效人民中國之誠心忠悃，銳志勵進，攬權□位，多所主張，多所布畫，多所接納，正與其在勉仁之心與跡同。……惜澄之遽死也！雖然，澄剛性人，過剛則折，歷屆運動中，其受屈而自殺者，如席朝傑等，無一非剛直之人。儒佛之學，未能使澄外榮辱而小天地，身與境俱空，而更以忠心為共黨之敵，有屈原、賈生之痛，宜其以怨憤傷肝而死也。嗚呼傷哉！顧以澄之性情，處今之境，早死實澄之福，況「五十之壽」，於王靜安先生自沉之壽（五十一）略等，亦可無所惜矣。……自反右以來，宓未敢訪澄，亦未通音問，澄遺命知勉謁宓，是知宓者。……又與委約，農假日，委來此，導宓上山祭澄墓。

<sup>77</sup> 石瓊生：〈跋磁器口紀事〉，見《心香淚酒祭吳宓》，頁448-449。



……（《宓續》，第3冊，頁282-283）

吳宓先生目睹先生在反右中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極為同情。

在先生去世後五年，吳宓先生在讀史時，仍然堅持認為先生為了國家而遭禍，「近年右派之遭懲，與澄等銳志立功，引賢圖治，為黨、為國、為校，而不免於死也……」（《宓續》，第6冊，頁87）。

在先生去世後七年，吳宓先生仍夢見先生：「夢旅居某地，星期晨，澄來，似別僅一年，握手。宓曰，我們之社教運動，亦同公在反右中所遭受者耳。……」（《宓續》，第7冊，頁191）。

十二日，先生遺孀周觀成女士攜長女知勉，拜訪吳宓先生，告雜事，又議售澄遺書事，吳宓先生應允代為出售（《宓續》，第3冊，頁286）。

七月，先生的章門師兄劉文典先生，亦以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心情極為鬱憤，在昆明去世（《宓續》，第3冊，頁464）。

十月，先生遺孀為先生立墓碑（《宓續》，第3冊，頁500）。

十二月十八日，吳宓先生表示「澄夫人回鄉後，宓願負責供給李知勉之全部費用」云云（《宓續》，第3冊，頁541）。

二十一日，知勉被就讀的西師附中師生指責為右派分子之女而被「時加譏辱」，「欲效某某同學私走蘭州，改入技術學校，宓力言其不可。知勉又欲此寒假即往遼寧鞍鋼其姑（多子女）處（轉學初中三年級）。宓命其先稟姑再商定各事，尤其轉學已允收乃去。至其姑處後，宓年助學費若干，亦應函商議定云云。知勉又畏鬼，不敢上其父澄墳山，宓責其幼稚」（《宓續》，第3冊，頁543-544）。

先生去世後，在犍為縣的家鄉——龍孔公社三大隊，尚有先生叔父、三弟等親人。因此，西南師範學院擬將先生夫人周觀成女士、次女李知方送回龍孔公社三大隊，投奔先生親人，在農村務農，吳宓先生亦曾勸告過（《宓續》，第5冊，頁94）；受到先生被打成右派的牽連，先生夫人也受到了衝擊，身體、精神兩憔悴，以至於行走得倚靠拄杖（《宓續》，第5冊，頁94）。到了一九六二年八月，先生夫人、次女仍留在重慶西師校園。不久，先生夫人攜次女帶著吳宓先生資助的四十元、先生另一友人談壯飛（內學院蜀院培養的佛學研究人才，後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捐助的十元（《宓續》，第5冊，頁410），回到先生在犍為縣的家鄉，先生夫人旋於當年十二月底去世（《宓續》，第5冊，頁402；第10冊，頁238）。

長女李知勉則仍留西南師範學院附屬中學就讀初三，吳宓先生「謂以後量力，月助十元或五元」，「仍有意外，不足之數，由宓擔付給」，一直「資助到知勉畢業得職」（《宓續》，第3冊，頁500、515；第5冊，頁94）。一九五九夏，長女李知勉初中畢業，未准報考高中後為重慶電力技術工人學校錄取，並於一九六一年畢業，分配到重慶大溪發電廠工作到退休（《宓續》，第4冊，頁411）。

先生長弟源委先生（字端深）解放前曾任憲兵、員警一二年，與夫人熊家璧女士，時仍在西南師範學院圖書館工作（《宓續》，第7冊，頁242、251）；先生胞妹李培華、王自杭夫婦（皆黨員）（《宓續》，第4冊，頁199）則還在東北工作。

先生三弟源善則仍在犍為縣龍孔公社三大隊，六〇年代初成為民辦中學教師（《宓續》，第5冊，頁433），後為政協委員，亦能詩。揮賦有〈安樂窩〉（1995年3月）詩<sup>78</sup>、〈詩三首〉（1997年）<sup>79</sup>。

解放後，先生發表的文章很少，曾將自己研究中國魏晉南北朝史的成果編為《魏晉南北朝史》一書，而且清繕完畢，後不知所終；先生未刊之遺稿，亦皆散失。

蒙默先生說：

師母不知學，未就業，二師妹，長十餘，幼僅數歲。先生逝世後，院方將師母及師妹送返犍為農村，故先生遺稿無人收拾，遂皆散失。聞先生有《魏晉南北朝史》一編，已清繕完稿，先生自知不起，以付摯友吳宓先生。吳先生於「十年浩劫」中亦未免於難，遭遣返故里，不久仙逝。此稿不審仍在人間否？<sup>80</sup>

先生去世後，吳宓先生作為老友，在資助、監護先生就讀初中的長女李知勉（按月支付費用）、處理先生遺物——一隻大箱，內盛「澄所遺字貼及畫冊」（即先生所書之字、所作的畫多幅）、部分藏書（〈澄遺書〉）等事務上，有過比較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監護李知勉上，作用更大。

<sup>78</sup> 李源善〈安樂窩〉詩云：「窩稱安樂越千年，名實相符始今天。問暖噓寒有大士，扶傷救死有華扁。安樂窩人添安樂，教玉泉變救命泉。敢問當年邵夫子，可曾安樂過一天。」見《犍為縣文史資料》第6輯（1996年），頁59。

<sup>79</sup> 李源善〈詩三首〉其二〈慶祝香港回歸緬懷小平同志〉：「一國兩制初見功，惜公未遂香港遊。值此普天同慶日，盛況傳真達九重。」參見《犍為縣文史資料》第6輯（1997年），頁191-192。

<sup>80</sup> 蒙默：〈蜀學後勁——李源澄先生〉，《蜀學》特刊第2輯（2007年），頁51-52。

### 1959 年

一月一日，新年元旦，先生長女李知勉前往吳宓先生宿舍拜年（《宓續》，第 4 冊，頁 3）。

四月四日，吳宓先生應邀與來重慶視察的老友、全國政協委員梁漱溟先生晤面時，專門為梁漱溟細述先生「獲罪右派及病歿情事」（《宓續》，第 4 冊，頁 65）。

### 1960 年

五月二十七日，吳宓先生在成都，與先生故友韓文畦遇，「宓欲以澄歿及身後事告」（《宓續》，第 4 冊，頁 350）。

六月底，到成都參加四川省第二屆人大會，又與來訪的繆鉞先生「重述澄病歿詳情」（《宓續》，第 4 冊，頁 105）。

### 1961 年

八月十九日上午，先生夫人周觀成訪吳宓先生，「謂必須八月底到鄉（犍為縣），現正售賣粗重之物還債云云。宓告以回鄉全數旅費，當由宓籌給，似乘輪舟行較便，並告以昨晚宓對端深所談」（《宓續》，第 5 冊，頁 403）。

### 1962 年

七月二十八日，「下午，重讀李源澄遺著《秦漢史》，以政治之眼光讀史，持論明通，極佩」（《宓續》，第 5 冊，頁 385）。

八月五日，「晚，讀《秦漢史》」（《宓續》，第 5 冊，頁 392）。

八月十八日，「上下午，讀李源澄《秦漢史》，深佩其論政理及史事之明達」（《宓續》，第 5 冊，頁 402）。

### 1964 年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即四清運動）開始，源委先生「將家中所存澄之照像、信劄、著述等，全部焚毀無餘」，以至於先生長女知勉「並其父之生年月日皆不知云」（《宓續》，第 7 冊，頁 334）。

### 1973 年

一月十五日，先生長女知勉拜謁吳宓先生（《宓續》，第 10 冊，頁 281-282）。

五月十九日，吳宓先生在西師宿舍，整理自己所收藏的先生著述及與先生的往來信函。「以李源澄、蒙文通之學術論著及書函，各編成一包。王恩洋之學術論著（已引、未印），昔已編成一大包。皆置架上」（《宓續》，第 10 冊，頁 391）。

先生資助過的晚生、勉仁畢業生饒緒道先生，「力勸宓增助知勉（有三女一子）之家用，謂十元太少，應增為每月二十元或十五元，宓決即增為二十元云云」（《宓續》，第 10 冊，頁 440）。

已經公開出版的吳宓先生《吳宓日記》在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結束，直到本年結束，吳宓先生仍定期資助先生的兒女（最後一次的記載為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九日）（參見《宓續》，第 10 冊，頁 545-554）、不定期資助先生的胞弟（最後一次的記載為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參見《宓續》，第 10 冊，頁 556）等親屬，有理由相信，直到一九七八年一月十七日去世，吳宓先生沒有停止對先生親屬的資助。先生親屬對於吳宓先生，也是視為親人的。如逢年過節、祝壽時日，亦常邀吳宓先生參加（《宓續》，第 10 冊，頁 298）。

對於先生的親屬，吳宓先生的資助可謂惠及三代。如知勉「第三女紅渝患病，求宓助給醫藥費」，吳宓先生即允付（《宓續》，第 10 冊，頁 384）。

### 1980 年

隨著撥亂反正的展開，中共中央下發六十號檔，即中共中央批轉中央統戰部〈關於愛國人士中的右派複查問題的請示報告〉的通知，宣告改正對二十二名上層愛國人士的右派問題，潘大逵是其中之一。檔指出，「章羅同盟」（後稱「章羅聯盟」）在組織上並不存在，在批判「章羅同盟」時提的「軍師」、「謀士」、「代理人」、「骨幹」、「分店」等組織性的帽子應予取消，當年所謂「章羅聯盟四川分店」的組織性帽子，趙一明「提出了章羅聯盟的反動綱領在雅安具體實施的方案」問題，也就一風吹了。趙一明的右派問題，也在本年改正<sup>81</sup>。

<sup>81</sup> 根據趙錫驊先生的回憶，趙錫驊：〈「章羅聯盟四川分店」真相〉，《炎黃春秋》，2004 年第 2 期，頁 18-22。

### 1981 年

先生的冤案得以平反昭雪，重還清白。

### 80 年代末

四川省文化廳下屬一家公司投資五千萬元開發靈巖山，規劃在靈巖山光大佛教，建寺院和塑一〇八尊形態各異的觀音像（仿全國各地的著名觀音像），建成後，每年接待遊人二萬餘位。

### 90 年代

新加坡一國學大師夢見先師告知，儒教的發源地在靈巖寺，他專程回大陸都江堰調查核實後，在靈巖寺修建了儒教紀念館。

### 2004 年

六月，胡昭曦先生的論文〈蜀學與蜀學研究權議〉發表（《天府新論》，2004 年第 3 期，頁 114-117），指出：作為源遠流長、特色突出並具有全國影響的地域文化，蜀學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傳統的蜀學是以儒學為主的學術文化。今日所說的蜀學，是指四川地區的學術，其重點在文、史、哲，其核心是思想、理論，它是中國重要的地域學術文化。蜀學研究是以具有蜀學學術特色和與四川學者有學術聯繫為範圍，其時間上限為古蜀文化和巴文化，其下限及於當今。加強蜀學研究，可以豐富和加深對我國歷史文化的認識，有助於培育民族精神，促進我國經濟文化的發展。

### 2006 年

四月，胡昭曦先生的專著《四川書院史》由四川大學出版社出版，「附錄（三）」（頁 388-389），節選《犍為縣志》之〈先生傳〉（頁 717），另標為〈李源澄與灌縣靈巖書院〉。

七月二十八日與七月二十九日，四川大學古籍研究所與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成功地在近代「蜀學」的策源地之一——四川大學舉辦「海峽兩岸晚清蜀學座談會」。座談會由四川大學舒大剛教授與臺灣中央研究院林慶彰教授共同主

持，邀請相關專業的學人和晚清蜀學先賢的哲嗣，安排了三十三位學者正式發言，共收到交流論文四十餘篇。會上，海峽兩岸學人互贈最近出版的學術著作，四川大學古籍所還向與會者贈送了四川大學《儒藏》學術叢書十二種、《金景芳學案》及四川大學《儒藏》評論資料選輯等。會議期間，「晚清蜀學」這一主題，海峽兩岸學者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探索和討論。

七月二十九日至八月三日，由臺灣著名學者林慶彰、蔣秋華兩位教授帶領的晚清蜀學考察團在川進行了為期一週的考察訪問。臺灣學者不辭辛勞，冒著酷暑，對錦江書院、尊經書院的舊址，「三蘇」、楊慎、劉沅、劉咸炘、廖平、宋育仁、吳之英、吳虞等蜀學先賢的故居和塚墓，一一進行憑弔和踏勘。

## 2007 年

一月，林慶彰先生的論文〈研究民國時期經學的檢索困難及應對之道〉發表（《河南社會科學》，2007 年第 1 期，頁 21-24）。

三月三十日下午四點，蒙默先生在四川大學儒藏學術系列講座第二十八講，主講「廖季平的經學傳承」<sup>82</sup>。演講內容分六個部分，在第一部分「緣起」中，蒙教授指出經學為普通民眾乃至有一定學識的出版編輯等所不識，近幾十年經學幾無傳人。而另一方面，某些經學名家卻被知識界遺忘，李源澄便是其中一個。李源澄是蒙文通先生得意弟子，川大畢業後曾遊學全國各地，與章太炎、錢穆等學界名流交好，受時人之讚譽頗多。蒙教授少年時曾師從李先生，對其學問人品十分瞭解，這次講座便主要講李先生對廖季平與蒙文通先生的經學思想的傳承，也旁及廖、蒙對近代經學的開拓性貢獻。第二部分，講李先生對廖氏開創的以禮制分今古文的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其中提及廖氏對經學的巨大貢獻，蒙先生對乃師的一定程度的修正，李先生的具體化。第四部分，主要涉及李先生對解釋經學的種種解釋。首先他認為經學講的就是經義，義是思想、理想。先秦儒家思想寫在歷史中，以古史為經，所以才有從歷史中讀出大義經學。經學與儒家為一體。經學別漢宋，漢為外王之學，通經致用，似近之所謂社會科學；宋明義理，內聖之學，似近之所謂哲學。李先生曾有《經學通論》一書，蒙教授曾見過手稿，並聽其講授過。第五部分，李

<sup>82</sup> 龍成鵬：〈我院舉辦「廖季平的經學傳承」學術講座〉，見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網站的報導 <http://historytourism.scu.edu.cn/history/news/news2007/news20070331.htm>。



先生在史學方面的貢獻。曾有《秦漢史》一書，錢穆先生作序。錢先生對該書評價極高。最後，蒙教授對經學的未來做了番評論。

六月，舒大剛先生發表論文〈晚清「蜀學」的影響與地位〉（刊於《社會科學研究》，2007年第3期，頁165-170），從構成蜀學的學人、學校、學術三大要素，考察了古代以來到晚清的蜀學，全面地評估了巴蜀地區學術之地位與價值。

十一月，蒙默先生的論文〈蜀學後勁——李源澄先生〉在《蜀學》特刊第二輯發表（頁42-52）。

十二月，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林慶彰先生，發表〈李源澄著作目錄〉，在講述先生「小傳」後，該文將先生的著作分為「專著」、「論文」（又分為經學、哲學思想、政治與法律、社會、經濟、傳記、文學、序跋、時評等九類）、「編輯」等三個部分，進行了總結。該文為目前見刊的先生文字最詳盡的輯錄。該文刊於臺灣《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十七卷第四期（頁61-74）。